

三江文史

SanJiang Wenshi

第8辑



政协三江侗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
2010年12月



冠军回家

杜宜摄影



风雨桥百家宴
韦国政摄影



侗乡大道夜景
朱永辉摄影



三江口风光 石峻松摄影

《三江文史》第八辑

目录

由“怀远县”到“三江县”的由来	唐志宗
兴建厘金滩电站大事记	曹积尧
五百和里的深厚人文景观	杨文朴
三江“三家村”出笼始末	杨通山
三江“千斤县”的由来	梁 谊
难忘的三江程阳桥“四清”岁月	谢镒宗
三年困难时期	凌绍光
福禄“三月三”民族传统花炮节	赖守基
三省人民团结协作的丰碑	梅 岭
三江抗美援朝运动	吴炳金
丹洲古城概略及地图碑考述	刘汉忠
回忆丹洲、古宜两地首例死刑案	杨及愚
枝柳铁路三江县路段走向和县火车站定点商讨经过	曾 飞
第一批下放农村劳动的大专院校学生	龙宪彰
古宜会馆的起源、发展和消忙	欧邦玉
侗族歌师亚华的故事	谭华铭
回忆发展杂交水稻	覃安民
三江中学“两进两出”牛浪坡的经过	张昌怀
知县马希武其人其事	马先广
布央—三江茶叶产业开发第一村	杨云善
三江第一份县报	黄启轩
农学家马保之重游良口故地	廖韦春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何不直上古宜	杨及愚
九江水电站抢险	曾 飞
打野猪趣事	曾 飞
三江县火力发电厂始建回忆	赖守基
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侗族民兵石文功	欧邦玉
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侗乡女民兵营长侯芽妹	欧邦玉
三江县首批的士潇洒亮相	吴永华 石 澜
三江县解放初期交通运输概况	赖守基
贲公佬的故事	肖启忠
对山歌的故事	肖启忠
诗歌选登	
山歌摘选	贲运发
难忘的插青生涯	罗昌华
斗牛场	荣应福
县城鼓楼赞	荣应福
《三江文史资料》读后感	荣应福
端午节感怀	廖韦春
乡村巨变	廖韦春

由“怀远县”到“三江县”的由来

唐志宗

当今的人们对“三江县”的认识自不必说，但说到“三江县”的“先祖”“怀远县”，却知之不多，而由“怀远县”易名为“三江县”更是知者甚少。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经过普查，发现全国有3个“怀远县”，即安徽省、陕西省、广西省各有1个“怀远县”，当时以安徽省立县最早，故应保留安徽省的“怀远县”名，其它两省的“怀远”应另取县名。因此，广西省议定“怀远县”更名为“三江县”，文曰：

广西怀远县，明万历19年（1591）复置，迄今仍之。与安徽、陕西两省重复，设置在安徽怀远县之后，应即酌改。查该县于明洪武十年置三江镇巡检司，迄十四年置县，旋又为诸瑶所陷，万历十九年复置，拟定名三江县。

民国三年（1914年）

此外，因明洪武时立县治于老堡口，三江镇巡检司的“三江”之名，其取名的缘由有两种说法，一是南面融江，西向溶江，东北向浔江，故称为三江。二是西向溶江，北向苗江，东北向浔江，亦称为三江。两种说法各执其理，谁为正统？笔者认为，要考其究，必离不开两大因素，即历史状况和地理环境。就历史状况而言，最早出现“三江”二字是明朝三江镇巡检司，而该巡检司时设老堡口（即三江口）。就地理位置而言，三江镇巡检司所处的老堡口，正是三条江的汇合处。因此，“三江”的来源当属融江、溶江和浔江最为贴切。

兴建厘金滩电站大事记

曹积尧

厘金滩电站是我县第一个骨干电站。自 1987 年 12 月动工至 1990 年冬竣工投产以来，为三江工业升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据统计：自投产发电至 2010 年 6 月，共为国家输送 10.5 亿度电。现债务已还清，还向地方缴纳 3150 万元税金。世人称：水电站是“水上银行”，这话一点不假。

1987 年 2 月 18 日，县委常委听取杨秀伦传达自治区水电局长会议精神。三江列为全国第二批电气化县，同意安排厘金滩电站，要求加快项目评估，做好前期工程准备，争取三月评估会上列项。

县委、政府及经济顾问“三老”参加。会议决定：成立电气化领导小组（工程开工后改名为：厘金滩电站工程指挥部），任命李奇明副书记为组长（指挥长），邓家斌（县人大副主任）、杨秀伦（水电局局长）、黄东（计委主任）、唐超（供电公司经理）等为副组长（副指挥长），办公室设在水电局（工程开工后搬至厘金滩）。

1987 年 3 月 5 日，县委邀请水电、计委、林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厘金滩电站第二套设计方案，即由三台机组改为四台，每台 3600 千瓦，共 14400 千瓦时，年利用 5600 小时，年发电量 8096 万度，总投资 2474 万元（按 1980 年不变价计算），平均每千瓦投资 1718 元，为廉价电站。

为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会议决定从林业更改基金中拨出 10 万元作活动经费，并派杨秀伦和黄东专程到南宁汇报我县的情况。

4月16日，县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通报了厘金滩电站设计方案已通过自治区专家评审，列为当年基建项目，号召全县各族人民为之努力奋斗！

晚上，四家班子领导讨论电站自筹资金问题，决定县财政安排200万元，向地区、自治区财政借400万元，社队林场借250万元，共850万元。

4月22日至27日，县委书记曹积尧率领经济顾问阳烈（原副县长）和赵淑媛、劳肇立、唐超4人赴南宁，向区财政资金管理所借得200万元，地区财政100万元，时限三年还清。

4月26日，向自治区水电厅周、覃、杨、刘四位厅领导汇报厘金滩电站资金自筹情况，要求尽快批复项目设计报告书，以便办理土地征用、银行贷款手续。

4月27日回到柳州，拜见地区水电设计院阙维陶院长等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感谢他们对厘金滩电站设计所作的贡献，并要求他们尽快完成施工设计和图纸，以便早日开工。

5月16日，厘金滩电站最后评估论证会在我县召开。地区农行伍行长、水电局齐副局长、地区设计院阙院长等一批领导和专家参加会议。经过两天论证一致通过项目设计报告书。伍行长当场拍板贷款1000万元，加上国家电气化县中央补贴640万元，林业更改基金100万元，城乡开发基金50万元，以及县财政安排和社队林场借款，区、地财政借款，共2540万元，基本落实了资金问题。

8月20日，厘金滩电站工程指挥部向县委常委汇报：承包工程已确定给自治区水电工程局岩滩水电工程建设公司。发电机组性能已调查完毕，

决定购买河池水轮机厂生产的机组。每台机组 170 万元，先采购两台共 340 万元。厂方要预付 30% 订金，即 102 万元，加上运输等费用共需支付 150 万元。常委会同意这个意见。

会议决定：一、成立一个土地征用组，负责办理征地手续；二、料场确定三角渡口、扶平垄山坳，由政府出通告，统一采集；三、同意指挥部邀请区水电专家来三江论证《工程管理与节约》。

10 月 31 日下午，在县招待所举行厘金滩电站工程承包合同签字仪式，四家班子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11 月 2 日早上，承包方第一台 220 匹马力推土机在鞭炮声中，隆隆通过古宜大桥驶向工地。

晚上，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侯德彭到三江，在汇报中谈到电站施工在即，土地征用报批手续未办好，主要是区土地局迟迟未批，不知何故？侯听后满口答应帮助解决。随后他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我。叫县里派人去南宁找农委主任黄友嘉，由他出面找土地局领导。

11 月 4 日，县委派李奇明、罗黎明、赵文洲三位副书记尾随侯部长上南宁，结果顺利解决土地征用报批手续。

11 月 24 日下午，厘金滩电站开工典礼在工地隆重举行，会场设在河东岸草坪上，到会 1000 多人。参加大会的有历任县委书记、县长：柳林、何俊、秦振武、莫虚光、曹蔓山、张胤、王醒民、莫凡植、姜肇初等。秦振武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致贺词。下午 4 点 30 分第一排开工炮打响，拉开了厘金滩电站工程动工序幕。

1988 年 4 月 30 日，国际劳动节前夕，县四家班子领导到工地慰问，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承包方汇报。承包工程公司覃经理、杨书记、张总工程

师等参加，他们说：自开工以来进度不理想，四个多月仅完成开挖土石方一万多立方，占厂房开挖任务 50%，尾水口一万四千多立方还未动。他们说最大的问题是水泥和沙子赶不上。他们的水泥 5500 吨被滞留怀化。柳铁通知：5 月 1 日前外地车皮不准进广西。

怎么解决这燃眉之急？下午县委召开木材、物资、交通、建筑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商讨决定：物资公司借水泥，木材公司售木材，建筑公司加班采沙装卸，保证电站正常施工。

1988 年 5 月 20 日，常委会全天听取和讨论厘金滩电站工程指挥部汇报八个问题，根据讨论结果作出《会议纪要》下发。八个问题大意是：李奇明副书记脱产专抓，确保工程如期完成；指挥部搬上工地，保证工程安全渡汛，避免损失，正副指挥长轮流值班；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特别是隐蔽工程质量要高度注意，同意聘请水工和安装两名专家监督，给予适当报酬；输变电工程项目同时开工，投资 800 万元想办法筹措；职工培训早作准备，第一期招收 30 名（水电系统 15 名，社会 15 名），送广西水电学校培训，时间两年，中专待遇……

9 月 18 日，厘金滩电站工程指挥部向县委汇报工程情况：

工程进度缓慢。开工 10 个月，土石方任务只完成总任务的 28.6%，浆砌石只完成 12.9%，混凝土只完成 16.9%，距离合同要求很远。进度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材料价格上涨，“三材”供应跟不上，洪水多次冲毁围堰影响施工；资金管理混乱；工区不推行小段包工，工人收入低，没有积极性等。但最关键的是领导班子软弱，第一把手缺乏组织指挥能力。如果不加强或调整领导班子，该电站将变成“胡子”工程，甲乙双方将受到重大损

失。

常委们听了汇报后，感到问题严重，决定由曹积尧书记带队，四家班子各抽一人，指挥部三人，地区水电局一人共 8 人，赶赴岩滩水电工程局汇报。

9 月 22 日上午，工程局第一把手柳局长、唐副局长、马总工程师、人事处曹副处长等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柳局长当即表示：

一、关于领导班子问题，局党组已研究几次，现决定采取组织措施以予调整。成立工程指挥所，调陈兹光任指挥长，与原工程公司合一，统领厘金滩电站工程。

二、施工重点在厂房基础，应集中力量攻坚，力争明年 7 月机组安装完毕，12 月发电。

三、三江经济比较困难，我们不想赚三江的钱，只要“不赔不赚”就行。

听了柳局长意见后，我们补充要求：一、请局党委以文件形式下达《关于加强厘金滩电站施工的若干意见》；二、物价上涨，承包方发生困难，工人工资不能按时发放，请总公司增拨周转资金，我们甲方保证按工程进度拨款；三、至于按自治区物价新标准编制新的概算，补签“补充协议”要回去商定；四、请局主要领导亲临三江视察一次，鼓舞士气，促进局面改变。

这次我们去岩滩汇报没有白跑，不久班子调整，之后工程进度明显加快。

1988 年 11 月 23 日，李奇明常务副县长主持召开电站工程座谈会，

邀请地区水电设计院谭副院长、梁工程师和电站工程公司几位领导参加，研究主题是：什么时候大江截流？

工程公司领导说：前段施工不理想，原计划 10 月截流，由于材料供应不上，洪水四次袭击，加上两次停电等原因，打破了我们的施工计划。他们建议大江截流安排在明年下半年进行。今年集中力量搞厂房、尾水渠、重力坝基础开挖，以及开关站（输变电工程）建设等。明年 6 月 30 日前搞完厂房，7 月机组安装，年底试机发电。

地区设计院领导一致赞同工程公司意见，并保证按时供应图纸，绝不影响施工。这次座谈会很成功，三方沟通了思想，统一了行动，对加快电站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为了贯彻会议精神，促进有关部门通力协作，指挥部决定：印发《会议纪要》发给有关单位。

经过三方的协同作战，历经整整三个寒暑，克服主观上的许许多多困难，厘金滩电站工程终于 1990 年 12 月建成投产，两台机组试机发电成功！三江侗乡的夜晚从此后更加明亮、炫丽、迷人。

五百和里的深厚人文景观

杨文朴

以和里、南寨为主包括归斗、燕茶等村寨，古称五百和里，是古代侗族地区款文化遗迹。邓敏文、吴浩同志著《没有国王的王国》一书中说的是侗族地区自治性款联盟组织形式，它遍布侗族地区，如千家梅寨、五百晒江、二百良口、五百唐朝，都反映这种组织形式，五百和里因此得名。

和里是宋末元初时期十二大姓开辟浔江的歇脚点，明清时期是商业繁华的商埠。历史上被喻为小长安（以融安县长安镇比喻），是商品周转的集散地，五百和里是它的商品销售市场之一，是通向溶江苗江的要道，与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有密切的联系。明朝万历年间（1581），在苏朝阳政府中的12位官员中，有6位属本县籍人士，是明朝加封的义民官，赐6把刀，名为六刀酋长（其中和里杨金亮是六刀酋长之一）。这是苏朝阳为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以柔克刚，“以瑶治瑶”的统治策略。明隆庆年间（1572），发生了各族人民抗暴斗争，知县马希武被杀死，次年明朝廷派兵镇压。苏朝阳知县到任后心知肚明，在三江历史进程中以武力进剿，民族隔阂更为严重。他不敢在县属居中的和里设立县治，又见和里群众不愿献地就做了顺水人情，选在能进能退的丹洲立县治。其实，在历次县治选址中，和里虽然地理居中，土地宽平，四面环山，但交通闭塞而不宜立县治，后仅在和里设溶江总局，这块园地至今仍称为“县底园”。

和里古寨是侗族大歌的发源地之一。至今流传的夏亚华（侗语意：亚华的歌，“夏”字并非姓氏，即“歌”之意）、夏国祯是指和里杨植敏、南寨杨国祯编的侗歌—夏耶。据民国县志记载，杨植敏生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亚华是他的俗名，杨国祯生于咸丰、同治年间，两人都是不第秀才，出考不中，在家专编侗族大歌。夏耶文化传遍溶苗两江的侗族村寨，他们编的歌有《开天劈地创建人类文明歌》、《历史人物故事歌》、《男女爱情歌》等。五百和里的群众，逢年过节，用歌互相交往，联络感情，增进团结。侗族大歌也是外出“月也”的主要内容，夏亚华在溶江河和苗江河的各村寨影响很大、很广，甚至流传到拱洞、平卯一带。现在仍健在的老一辈人讲多

耶就会讲到亚华的歌，亚华和他的歌一样深入人心。随着戛耶的发展，促进了多种文化的渗透和交流，吸收汉人文化的营养，发展到唱桂戏、调子戏。最早成立的是南寨的“人和班”和和里的“庆祥班”，以后发展到六寨都有戏班，成为和里南寨的主要戏曲文化。各寨都通过学戏剧、学文化增长知识，也增加了“月也”的内容，通过唱歌、唱戏，交流感情，增进团结，共同进步，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推动五百和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

五百和里的侗寨有同姓结婚的习俗。有千年历史的五百和里古寨，都集中在一个大田垌里，同姓居多，绝大多数都是姓杨，而古代人口不多，同姓同寨被称作兄弟姐妹，不能结婚，结婚要到外地很远的村寨去找对象，如流传下来的古代歌词：“古时结婚要走四十天的路程，往返很艰难，挑的糯米变成黑碳，酸鱼酸肉出粪蛆，男人穿的裤子破成丝条，女子穿的裙子破成布条，半路被蛇拉进洞，回家无面见爹娘”。虽属夸张，但在古代交通不便，深壑高峰，森林茂密，野兽出没的状况下可想而知，说明男女结婚困难。传说至清朝初期，贵州、湖南、广西的二十多个侗族地区，聚集了九十九个“款首”，九十九个“寨子头人”，集中在贵州的黎平县中朝大款坪，商讨破姓开婚，实行分寨、分姓、分楼，就近结亲。五百和里派了款首寨老出席，回来后议定五百和里，只要同姓不同源（不同地方来），同姓不同节（分冬节初一初六），同姓不同村（各住一个寨），同姓可以结婚。从此以后，五百和里六个村寨同姓人之间互相可以结婚，青年男女为不用走远地寻亲而高兴，正如歌词中说的：“从此结亲不用走远路，出门天晴不用带草帽，雨天不用带雨伞，婚前能相见，婚后生活甜”。为了避免外人闲

话，影响文人赴考的有关规定，不管你嫁来，或者我嫁去，男的都属杨，女的都属阳。这是五百和里同姓结婚的历史渊源。

五百和里是一个文物古迹多，民族风情浓郁的侗族村寨，它既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又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现有古文物很多，现存的风雨桥有人和桥、回龙桥、合安桥、永安桥、人安桥，还有和里的三王宫，南寨的文化古塔，乐善寺，鼓楼五座，戏台六座，宗祠四座。特别是南寨杨家祠堂《悠远堂》，建筑规模宏伟，结构独特，历史悠久，文史保存齐全，建造于 1880 年（光绪六年），建筑于杨姓入村后的第十七代人。这些古物大都建筑于明清时期。人和桥建于 1898 年 4 月，是一座有百多年历史的建筑物。三王宫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一座千年夜郎文化遗迹，是三江具有规模的古建筑文物之一，扩建于清乾隆，又经过道光、同治和民国时期的三次维修而形成现有的规模，整个建筑面积为 1700 多平方米，砖木结构，有宫门，内有木质戏台，两边有木质回廊，戏台前有用三千六百多块青石板铺成的天井，可容一千多人看戏，有中门、神宫两座，分别安三王神和天地相公，神宫两边两间偏舍，整个布局为二进三层，宫内文碑遍布，对联及各种神具，琳琅满目。挂在神宫边的铜铸大钟，是乾隆四十年长安十多家商号赠送的。和里三王宫是一座比较大的夜郎神宫，宫宇虽经五百余年的风雨沧桑而略显陈旧，但其威仪及神秘依然不减。改革开放以后，五百和里群众以及各地志士仁人，积极赞助，出资出力，多次进行维修，古物更日益显现出它的雄伟壮观。三王宫内设有三王神，传说是夜郎王竹多同的三子三王神，另一宫是天帝相公神位。这里每年农历二月初五为三王神的诞辰之日，六寨的男女老少以及慕名而来的各界人士或商贩都集中到此举

行祭祀庙会，五年一大庆，一年一小庆，小庆只举行一天，大庆三天。大庆还抬三王神象游六寨，烧香祭祀，唱歌、吹芦笙，六寨戏班轮流在宫内戏台唱戏，晚上新人进村“月也”、“多耶”，商贩做生意，热闹非凡。头人即款首宣布今天人们可尽情欢唱，过了这天，农事季节已到，也就是说春游“月也”季节已过，人们都要集中精力投入春耕生产，创造当年好收成。这实际上也是每年一次的闹春活动。

三江“三家村”出笼始末

杨通山

中国出现“三家村”的事，离现在已有 44 年了，许多往事已被遗忘。1987 年 2 月，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曾经编写一本《三江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2000 年 8 月，我也写了一篇《三江“文革”初期的回忆》（以下简称“回忆”），都曾提到“三家村”的事，但都没有详述。如今，有必要将当时的历史情况告诉后人。

三江当时是“四清”县，来三江参加“四清”运动工作队的有自治区和地区民委、统战部的干部，有中央民院、中南民院、广西民院的师生，加上从武宣、融安、三江各县抽来的干部及农干、工作队总数达 2000 多人。1965 年搞试点，1966 年全县铺开，每个大队都有一个工作队。

县里设有“四清县团”，代行县委职责。县团书记兼县委书记是区党委统战部莫矜副院长。我当时是文化科长，“下楼”（讲清问题后，解除了审查）后为文教卫生战线“四清”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都是工作队担任），我们县人民委

员会（政府）属于被夺权单位，县长们未“下楼”，文化科划归县团政治部直接领导。我有事就请示政治部的古主任或莫部长。莫部长很重视文化工作，他计划组织一台节目调去南宁汇报演出，要我带创作人员到程阳深入生活去创作节目。我和郑焕、苏甲宗、杨正礼四人到程阳一个月，写出几个节目，又接到通知：莫部长坐镇良口分团，要我们创作组和县文化队以及“四清”文化队集中良口，汇报工作，交流经验，便于领导审查。我们边写边排练，有时莫部长亲临排练现场指导。1965年5月下旬接到通知，他要赶去广州参加县委书记会议，从良口坐船下长安。临行前还交待我：“你要大胆点，写成就排练，节目总是边写边演边改，最后才能改好……”。

后来才知道，莫部长去广州参加华南局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就是布置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专题会议。

什么是“三家村”？词典上的解释是：泛指偏僻的小乡村。在学术界也有“三家村学究”的形容。

而我们讲的“三家村”则是文化大革命特殊年代的特定名词。原来《北京日报》开辟一个专栏名叫“燕山夜话”，刊登水平较高的论文和杂文，很受读者的欢迎，主要撰稿人是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后来有人说他们通过写文章进行反党活动，把他们三个学者型的官员打成“反党集团”。为便于与其他反党集团有所区别，故取名叫“三家村”。是指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人物集中的地方，后来就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后，要求各省、市、县都要揪出大小不同的“三家村”，为首者戏称为村长。当时各省的报纸都刊登本省“三家村”的消息，著名的作家学者多送进了“三家村”。

全国各省市县都要找个“三家村”，三江当然也不例外。莫矜部长在广州开会时，为了及时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给县团办公室打来长话，要求县里做好几点准备工作：一是准备好听传达的县级党员人员名单；二是准备好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三是准备好“三家村”对象名单。“四清”县团办公室主任黄某找文化馆长吴居敬要一本《三江侗族歌选》第三集（油印本），并要吴居敬译成汉文，但只能直译，不准意译，致使有的词不达意。他打电话到良口问我：“《三江侗族歌选》是你同意下发农村吗？”我答：“文化馆拿到科里来请示，我是同意的”，他就把电话放了，我想再讲几句也没法。

莫部长打来电话后第二天，黄某主持召开准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刚下楼”的县委书记李春旺和副县长韦昌孚，教育科长罗家阔，还有准备提任宣传部领导的同志等。会议专门讨论“三家村”对象和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由黄某提出“初步方案”，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只有李春旺大胆讲了几句：“杨通山是我们看着成长的，怎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某则说：“光一本《三江侗族歌选》就够条件了，何况他还有其他作品”，在黄某大摆“事实”之后，其他人不好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这样，“三家村”的对象就初步确定了。当然还要等县团书记回来审查同意。

1966年5月28日，我接到韦昌孚副县长的电话，要我回县汇报工作（都是黄某的安排），6月1日我从良口回到古宜。第二天在木桥上见到政治部的古主任，他说：“莫部长今天下午回到家，明天上午召开全县县级以上党员会议传达，一律凭票入场，你要按时到会哟”。接着他交给我一张入场券，上面写有时间和地点。

在此顺便说明一下，《大事记》中这样叙述：“6月3—4日，三江县‘四清’

县团在县委第二会议室召开全县区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似乎不大准确。据我回忆记得，6月3日是开全县县级以上党员会议，由莫矜传达广州会议精神，6月4日是开各分团负责人会议，也由莫矜传达，但规定传达到县团级的内容这天就不传达了。主要传达《五·一六通知》（当时仍保密，后来才公开发表为“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布置下一步工作。从此“四清”工作队就改为“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区级以上党员会是在5月中旬分片召开的，其内容是传达《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至于“全县区级以上干部会”那段时间没开过。

6月3日上午，在县委第二会议室召开全县县级以上党员会议，由于凭票入场，大家在外面等待，莫部长过来见我就问：“节目修改得怎么样？”我说：“修改好了，有的排练了”。当我入场时，见黄某和古主任交谈什么，似乎埋怨古主任发入场券给我。说明当时莫部长和古主任都不知道我就是“三家村”的对象。这次会的具体内容我在《回忆》一文中已有叙述，在此就不多说了。

《大事记》中写：“6月14日，‘四清’县团书记莫矜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最后宣布成立‘三江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黄启斌（宣传部长）、副组长凌绍光（税务局副局长）、组员罗家阔（教育科长）、雷电龙（监委干事）等人。”顺此补充说明一下，黄、凌二人是内部拟定为宣传部的正副部长，还未正式上任就被造反派一冲，部长也当不成了，而老雷当时已是文化队队长。记得在宣布领导小组名单时，就有问我：“教育科长和文化队长都是领导小组成员，为什么文化科长和文化馆长又不是呢？”我答：“一切由组织决定。”他们不知道内部已经确定文化科长和文化馆长为“三家村”的成员了。

6月18日，县直机关的文化教育战线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大洲集训，和三江中学师生一起，开展大鸣大放，集中火力查找“三家村”。张贴针对教育局长的大字报有几百张，而文化科长的大字报只有十多张，这与集训办公室领导人的要求相差甚远。

正如《大事记》中写道：“7月1日下午，以黄某为首组织编写对文化科长杨通山主编的《三江民歌选》大批判专栏……”。其实，他们批的这本书，不是我主编的民歌选，而是文化馆编的《三江侗族歌选》第三集，是油印本，共有“美帝是只纸老虎”，“不忘阶级斗争”，“歌唱社教运动”等15首新编侗歌，作者有农民、机关干部、政协委员，即是黄某要吴居敬翻译的那本书。黄写出大字报初稿后，叫人抄写并拿到县中去开辟专栏，横幅标题是《从三江侗族歌选挖出杨通山的黑心》，内容分为“放牛鬼蛇神出笼”、“为封建复辟鸣锣开道”、“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破坏四清运动”等十大罪状，于是，根据这一专栏，组织对我进行批斗。

《大事记》中又写道：“7月3日，文教战线开始对杨通山进行重点批判，被陪斗的有文化馆干部郑光松、吴居敬等，这就是三江的小邓拓，三江的‘三家村’……”。是的，在批判大会上，主持人公开宣布：三江“三家村”就是杨通山、吴居敬、郑光松。从7月3日至12日10天内，批斗我五天，吴、郑各批一天。陪斗的还有文联秘书梅岭，新华书店经理侯崇才。由于梅岭多嘴，陪斗后调侃说“陪斗什么，不过瘾，要搞就搞真的”，结果他被拉去批斗半天，一改过去的陪斗为主斗，并把他推到我们这个小组，画地为牢，天天在葡萄架下看书、抽烟、写检讨，等待接受更多的批斗。

原计划“三家村”揪出以后，先集中全县教师到大洲进行批判，然后到县

大礼堂批斗，还计划组织农民控诉团前来参加批斗会，我也作了思想准备。不料，中央民院师生起来造反了，矛头直指“四清”县团。6月30日，200名师生到县团会议室质问莫矜：“为什么不准我们回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县团认为他们在“闹事”，是反革命行为。7月1日，中央民院师生200多人在县委球场揪斗中央民院组织部长沈景贤（四清县团负责人之一），并将沈画黑脸，这是三江画黑脸的首例。

《大事记》中写道：“8月25日，中央民院师生串连部份县中、县师范、县直机关干部共数百人到三江‘四清’县团举行静坐，开展绝食斗争，要县团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并通电北京等地，得到中央民院等大专院校来电声援，此一事件轰动柳州和整个广西，即所谓‘三江事件’。三江中学、县师范参加静坐的学生以8月25日为名，组成‘八·二五’红卫兵组织……”。

当天上午，在大洲集训的千多人，在县中球场开大会，由黄启斌训话，然后浩浩荡荡地将大队伍开过古宜。下午两点，队伍又开了回来，奇怪的是，队伍高喊“打倒黄启斌”等口号，只见黄启斌被画得满脸花黑，垂头丧气走回宿舍。这一突然事件使人很难理解。集训大会难以继续办下去了，机关干部也回单位了，但不准我回家，软禁在文化馆内，大小便有人跟，从此开始过着“牛鬼蛇神”的生活。后来，全国革命大串连，把我们送到劳动基地，再后来又发生两派斗争，不关我们的事，只管在机关搞卫生扫厕所、种点菜，有时又帮扎高帽。

“三家村”成员最后受到了处分，而且是相当重的处分，与原来莫矜传达的“撤销职务、发80%工资”的标准相差甚远。

“四清”县团和中央民院师生对闹了1个多月，最后中央民院师生回北京

了。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造反有理”，“四清”工作队也要撤退了。为了做到有始有终，他们对“三家村”必然要作处理。本来我是“人委支部”的党员，但他们却把我的问题拿到“医院支部”去讨论处理。在工作队的主持下，讨论我和医院石达志的处分决定，最后给石达志开除党籍的处分，给我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县级降为一般干部，工资由 20 级降为 25 级，开除留用，机关监督劳动”。之后，我在机关和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6 个年头。**1972** 年离开干校前，对我的处分又进行一次讨论，结果是否定上述的处分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然后分配到县酒厂当厂长（时称为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工作队给郑光松的处分是“撤销职务，开除留用，机关监督劳动”。给吴居敬的处分是“开除公职，遣送回家交群众监督劳动”。这就是批判“三家村”几个月的“最后成果”。

“三家村”问题的平反。这一工作由县革委第三办公室完成。**1972** 年，吴居敬从农村收回机关，享受干部待遇。郑光松和我二人从干校分配到机关工作，但都没有恢复原职务。吴居敬因年老体弱，不久就退休回家。郑光松长期下乡搞中心工作，恢复职务后调柳州群众艺术馆当馆长。可能组织上认为我这个县级党员科长分配到四级单位当厂长不大妥，**1973** 年才调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我的“党内警告处分”也取消了。**1984** 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郑光松写信来要求专门为“三家村”下个平反通知书。当时我是县处遗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县里已经给“受错误批判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百多位同志（包括我们三人）下了一个总的平反通知书。如果为“三家村”再单独下个平反通知，人家会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平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三江“千斤县”的由来

梁谊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地区的大事。1958年中共柳州地委、行署授予三江县早稻“亩产超千斤”的称号，并奖给一面一丈二尺长的大红旗。我当年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亲自参与了这件事的各项具体工作，了解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早稻亩产超千斤，是真？是假？回答当然是假的。

1957年12月上旬，省委召开地（市）、县、区四级干部会议，三江县由书记处第一书记李春旺带队，各区委书记参加会议的有：古宜区罗耀辉、丹洲区荣定国、独峒区覃安民、良口区杨文朴、勇伟区侯邦廷、富禄区曹继秀、八江区唐远忠、林溪区荣成名、斗江区邓家斌、苗江区梁谊。曹积尧副部长代表农村部参加，并负责三江组的会务工作。

大会传达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动员全省干部群众投入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五大生产运动。会议气氛热烈，发言争先恐后。在地委领导的鼓励下，李春旺书记在大会上作《改变山区，赛过平原，为1958年实现千斤县而奋斗》的发言，受到各级各地领导的普遍关注。

1957年12月20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传达贯彻省四级干部会议精神，集中讨论能否实现“千斤县”的问题。会议开始批判民族地区“落后论、特殊论、条件论”的思想。

会议通过1958年的奋斗目标：粮食亩产1000斤，总产17000万斤，头苗

10 万亩，养猪 10 万头，造林 10 万亩。一年消灭旱灾、三年绿化三江。

会后，李书记委托农村部的副部长曹积尧，根据他在南宁的讲话和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撰写一篇社论，题目是《为 1958 年实现千斤县而奋斗》，这篇社论以《三江农民报》编辑的名义发表，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向“千斤县”进军，为“千斤县”出力。从此，实现“千斤县”的号角响遍全县东南西北中（见 1957 年 12 月 28 日《三江农民报》）。

在县委“千斤县”的号召下，全县迅速掀起了冬季五大生产运动热潮。据 1958 年 3 月 5 日统计，从 3 月 2 日至 4 日，全县投入劳动力 82000 人次，积肥 18100 多万担，平均每亩 1800 担，浮夸风开始露头。1958 年 3 月 14 日晚，县委召开电话会，由各区汇报积肥情况，八江区积肥 427 万担，其中布央社每亩积肥已达 3281 担，林溪区积肥 310 万担。

1958 年 6 月 5 日，县委传达地委县市会议精神，要求三江超过广东省的潮安县（今潮州市），修改生产计划报地委。从此，高指标、浮夸风愈演愈烈。6 月 26 日，县委召开三级书记会议，讨论通过“万担肥料万斤粮”的方案。据 1958 年 7 月 1 日各区电话汇报，古宜区的大竹奋战几个通宵积肥 2 万担，全区平均每亩已有肥料 1 万担，同意“万斤县”签名有 51189 人。良口区人造尿素 410 万担。独峒区的口号是：“四万担肥料二万斤粮”。丹洲区同意“万斤县”签名 18626 人，大字报 41592 张。斗江区同意“万斤县”签名 15170 人，大字报 53909 张。富禄区奋战三天三夜，每亩积肥已达 23000 担。全县拥护“万斤县”的大字报已达 644000 张，积得各种肥料 177000 万担。

1958 年 7 月 29 日，县委传达地委电话会议精神，关于调整粮食生产指标问题，区党委已提出实现亩产 1000 斤，地委提出保证亩产 1200 斤，争取 1500 斤，

三江县亩产千斤指标不动摇。

1958 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完全否定了客观经济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1958 年 8 月下旬，地委召开地、县、区三级干部会议。三江县由李春旺书记带队，各区委书记参加会议的有：古宜罗耀辉、丹洲荣定国、独峒覃安民、良口杨文朴、勇伟唐远忠、富禄黄元雷、八江陶元义、林溪荣成名、斗江侯世德、同乐荣光明，还有《三江农民报》的梅岭，我已于 1957 年冬调县委办公室工作，也随同参加并负责三江的会务工作。

当时三江没有公路直通柳州，我们一行从古宜搭班车到桂林住一夜，第二天搭火车到柳州。会议安排我们住在柳庆师范内，地委当天在柳州饭店设宴招待全体代表，席间还有柳江县的彩调团表演助兴。

会议期间的一天上午，地委召集各县委书记开会，下午李书记召集各区委书记开会，传达地委上午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地委在会上提出要树三江县早稻亩产千斤的高产典型。据李书记讲开始他不愿接受，怕三江粮食困难，后来各县委书记纷纷表态，三江的早稻禾苗我们看过了，一派丰收景象，如果三江粮食有困难，我们愿意调粮食给三江。在地委领导授意和各县委书记的支持下，李书记同意上报早稻亩产 1000 斤。

听李书记传达后，各区委书记也表示同意，同时商量几件具体工作：

一、如何上报产量。按 8 月 15 日县委的数据是，汇报早稻种植面积 103705 亩，实收面积 97592 亩，总产 8759 万斤，平均亩产 897 斤（生谷）。按该所报产量亩产是不够 1000 斤，但地委又要上报怎么办？讨论的结果是按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要求上报亩产 1000 斤。据李书记会后告知，他已将情况与在县主持工作的韦昌孚书记通话，县里的领导也同意上报早稻亩产 1000 斤，并由县

里组织报喜队赶来柳州。很快县委派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财贸部长蒋延昌及工会崔主席率领 20 多人来柳州，加上我们也动员在柳庆师范读书的三江籍同学赖汉英等参加。

二、写报喜材料问题，会议决定由办公室负责。我接受任务后抓紧时间起草，写好后交李书记审阅同意，我即到柳州市罗池路一家印刷厂连夜赶印，于 9 月 2 日早晨全部印好。喜报的报头是：“喜报 中共柳州地委：苦干、硬干、坚决干，粮食亩产要两万”。

三、报喜时间定于 9 月 2 日上午。当天早上县委农村部副部长曹积尧从河南省参观人民公社回到柳州，经李书记同意由他向地委报喜。这样，报喜队伍在蒋延昌部长和崔主席率领下，从驻地柳庆师范出发，途经五星街向地委大院行进。

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前，地委召开全体干部大会，进行表彰和奖励，三江县被评为早稻亩产千斤县，地委、行署授给一面一丈二尺长的大红旗。

我们还在柳州开会期间，县委根据地委组织参观外省的经验，县委布置全县进行禾苗大搬家。地委三级干部会结束，李书记叫我和他多留一天，他请覃宝龙专员（兼柳江县委第一书记）带领我们去柳江县参观禾苗搬家情况。沿途看到已搬家的禾苗挤在一起，密不通风，有的在田边安装鼓风机，搞人工吹风。我们下车打开禾苗一看，里边的禾杆多数已枯黄。看到这种情景，李书记摇头告诉我，到柳州后立即电告在县主持工作的韦昌孚书记，三江应立即停止禾苗搬家，但此时全县禾苗搬家已达 19526 亩。

从柳州回县以后，李春旺书记的心情是沉重复杂的。一方面要保住地委树立的三江早稻亩产超千斤这面大红旗，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三江各族人民的实际

吃饭问题。他曾多次向我提到是否可以从外面调进粮食，但调粮要瞒着地委、行署很困难。大概在 1958 年 10 月的一天上午，李书记叫我打电话给粮食局金化雨局长，叫他来县委有事商量。金局长来了以后，我们三人在李书记办公室商量调粮一事。老金意见可以到湖南、贵州两省与我县交界的县份去了解一下情况。李书记还叫我去购买二十多斤好香菇，每包一斤交给金局长去办事，我照办了。

金化雨同志利用在粮食部门的工作关系和经验，经过近一个月的往返奔波，回来告知喜讯，湖南、贵州两省的有关县，同意调粮食给三江，而且不要经过上级办调拨手续，由三江县粮食局与他们结算就可以了。于是县委研究由县长吴仕德负责粮食调运工作，各公社第一把手负责并指定一名领导专管调粮，采取车运和肩挑两种办法赶运粮食。此事一直瞒着地委和行署，直到 1959 年春天，三江县集中小队长以上干部到县进行粮食核产时，地委派农村部长祖振兴长期坐镇指挥，但在各种会议均不见粮食局长金化雨，他问：老金哪里去了。据统计，这次从外省运回的粮食共 2000 多万斤。

当年“五风”全国盛行，柳州地区环江县出现了粮食亩产十三万斤的高产卫星。三江也发生了早稻虚报产量，中、晚稻禾苗大搬家，致使下半年粮食减产，同时全县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当时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造成了粮食的极度紧缺。三江历来是缺粮县，地委还分配三江粮食征购任务 2800 万斤，这样的结果是雪上加霜，因缺粮出现了严重的疫情，导致很多非正常死亡，这是用生命换来的代价，教训极其深刻，令人十分痛心，后人应当引以为戒。

2000 年 7 月 2 日于柳州

难忘的三江程阳“四清”岁月

谢镒宗

六十年代中期，为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全国各地的部分农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大“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笔者有幸参加了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公社的大“四清”，亲闻亲见亲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参加革命实践初到侗乡

1964年秋，我们中南民族学院根据国务院关于大中专学生要参加一至一年半“社教”运动的指示，全校各系一至三年级的学生与教师参加了一年的“四清”运动。其中中文、数学系师生到湖南湘西，政治、历史系师生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目的是学习掌握阶级斗争理论和群众工作方法，改造世界观，为毕业后出来工作打好基础。

我们政治、历史系师生共 202 人，由院党委书记、院长白瑞西带队，于 9 月 10 日从武昌乘火车到柳州，14 日乘四部大客车到三江侗族自治县。车快到该县的政府所在地古宜镇时，被一条很深水的河流阻挡。我们下了车，然后由船工用大木船把汽车和人撑载过河，再爬上小斜坡，而后有一块平地，这就是汽车站了。最后我们带上行李又爬上一个山头，山顶上一块平地的平房就是机关幼儿园，我们就在那里住宿。幼儿园东北边山头是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用木板从山顶架桥过去可达。西南边山是一间电影院。我们住的周围山上都长满林木，空气特别清新。古宜镇街道就在山脚下沿河边延伸，大约有 200 米长，由于山较陡，街道不宽，商店不多，稀稀落落，只有些小百货店和旅店等。从街

往下是大河，有好几丈深，但山洪暴发不易浸上街。街上的人看电影或到机关办事要爬上山，山上的人要购物也要下山。总之开门是山，出门爬山，除了山还是山。

工作队由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莫矜、柳州地委及统战部吴德宗、庞湛恭与民族学院院长白瑞西及三江县委来领导。工作队员由自治区统战部、柳州地委统战系统和三江县抽人，加上我们民族学院师生共 452 人，分平铺、程阳两个公社。公社分片和工作组，各片正副片长和工作组长由自治区与柳州地委、三江县委抽来的领导干部担任。

放下包袱、自我革命的集训风雨

工作队集训非常严格。从 9 月 20 日动员到 11 月 30 日整整 70 天。其中学习阶级斗争理论与政策 8 天。在学习阶级斗争理论阶段，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决议（草案）》（即《前十条》）为指针，采用大会报告、小会座谈，忆苦思甜，联系实际，揭露社会上、生活中存在的敌对分子破坏、敌我不分、贪污挪用、生活腐化、多吃多占、自发搞资本主义等大量事实，使人们认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此来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树立阶级斗争观念，激发大家下大决心搞好“四清”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阵地。在“放包袱”自我革命阶段最关键。每个人都要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从参加工作那天起或从初中开始，对阶级立场、社会关系、政治思想、工作态度、生活作风等各方面都要进行深刻的检查，检查要指出问题，分析原因，说明危害，提出改正措施。之后要通过小组、片工作队批评，帮助。如果检查不彻底、认识不深刻，改正措施不力，要作第二次、第三次检查，人人事事都要过关，每人至少都要检查二次，有的四、五次才过关，检查出有经济问题要退

赔。当中有个贺县抽去的瑶族干部赵绍明，约 40 来岁，为了创造条件不参加运动，他把自己扮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说他过去同地主打长工，1949 年参加地下党，现在父亲、弟弟、老婆都是共产党员。但 1960 年以后变了，家里建了一座七间的小洋楼，门前还种了两棵榕树，到上海购买了几套沙发和漂亮的椅子，客厅挂有美丽的山水画，购有风琴、收音机和三部自行车。这是 1960 年困难时期，种木薯、红薯、养猪，卖高价发了国难财得来的。他还同父亲到上海、广州、南宁游玩，自己已和平演变成新生资产阶级了。他在小组放了“包袱”又到大会去放。大会分析批判时指出：只有彻底革命，全部退赔，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才是唯一出路。因为要作经济退赔，他就吃不好，睡不着了，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想来想去，最后找领导谈了真实思想。工作队派人到他家调查了解，弄清了真实情况，最后他被开除出工作队送回原单位。

我们班的同学陈某在班党支部“放包袱”时，他以帮助为名，说“班上什么事都要经过党支部，党支部搞的都是派性活动，党员是派性集团的主要成员，党支部已经烂掉了”。他根据中央文件说基层党组织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套到了班党支部头上，引起班上大多数同学不满，到他“放包袱”时，对他的问题进行了揭发。原来他申请入党未被吸收，对党支部产生不满，在校没机会发泄，现在终于拉拢同学李某某借机想搞垮党支部，以实现他入党的目的。谁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工作队把他与李某某两人开除工作队送回学校。我们片的副片长是广西龙胜县统战部副部长梁浩同志，他对爱人感情不好，准备离婚。对这件事他检查了多次，深挖思想根源，是和平演变开始，今后保证搞好夫妻关系，经反复检讨表态后才放他过关。总之，人人都有问题，都要经过批判过关。学生当中有的不问政治，纯粹读书，走白专道路，有的追

求吃好穿好，有的追求资产阶级恋爱观等等。我本人也检查两次、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敏感性不强，对思想有问题的同学教育帮助不力；二是 1959 年暑期回家参加大队干部会，吃一餐中餐没有交伙食费，属吃集体的，退赔五角钱。总之检查非常认真，批评非常深刻，纠正非常彻底，否则就过不了关，当不了工作队员。在工作队集训后期主要抓经济退赔，有的本地干部退赔的实物中有收音机、毛线衣等等。工作队集训结束时，大会宣布有 39 名工作队员不够条件而被开除送回原单位。还有的原来是正副队长和正副片长、组长的，因问题多也降级或降为一般队员。

通过这场革命，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不管是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都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都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严格的要求，都要有敏锐的眼光，要有分析和判断问题的能力，不然跌倒了还不知是怎样跌倒的呢！

进驻奇丽的程阳侗寨

集训结束后，工作队又重新作了调整，我的工作单位是程阳公社第八片，片长是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罗杰林。副片长有梁浩、孟宪明（南下干部）、兰任芝、郭经隆、刘士岳。我与秦忠藩老师当资料员。片长找我们俩人谈话，他说：“资料工作是领导的得力助手，我们的方针政策是由它定的，因此要求及时、准确、简练、保密、做到手勤、脑勤、腿勤，这是领导对你们的信任。”他讲得深刻、明确，我们能做老干部的助手深感荣幸。

工作队于 11 月 25 日作了“开赴前线的思想动员”。27 日有三分之一的队员先下队打前站，30 日全体队员进村。

经过集训，大家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进村那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收

拾行李，把行李搬上木船，请人用木船沿小河拖上程阳公社。八点半全体队员在电影院门口地坪集中，由三江县委副书记莫凡植带队步行向程阳公社前进。队伍浩浩荡荡拉得很长，沿途很多群众出来观看，真象部队行军一样。步行五个小时至下午一点半到达程阳桥。这座桥称作“风雨桥”，全是用杉木做成的，桥长约 80 米，宽约 7 米，高约 12 米，天面盖瓦，桥面有凉亭，桥内两边有长条凳供人坐。整座桥将亭、廊、桥创造性地结合为一体。我们队员步行本很疲劳了，但被这独特的桥梁建筑所陶醉，不停地观赏桥的精致构造和雕刻艺术，赞美它的独特风格。

在桥上休息片刻，先头队伍就带我们进村。我住的八片叫马安村，正好在程阳桥旁边不远，那里是一个小山头，山顶与东边山坳都是村民住的地方，小河好似银链在村边绕着流过程阳桥。这个村有 6 个生产队，76 户人家。住户之间疏密不一，驻村工作队员 28 人。工作队的纪律很严，一律不准称职务职称。莫矜部长原来在这一带打游击出名，他改名为莫勉真，其他以老张、老李、老梁……相称。对“三同户”（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只准做好事，办实事，不准添麻烦，不准吃肉类。我与秦忠藩老师跟片长住在陈基云家。陈基云是个年青人，爱人正坐月，第一天晚上他拿猪脚招待我们，我们表明不吃肉，就吃一碗糯米饭。在他家住了五天，发现他同干部有联系，又发现他阿叔有政治问题。片长说：“不可靠，赶快换一家。”就搬上山顶的陈正春家，这家三口人，陈正春两老已六十多岁，一个孙女 16 岁，叫陈相浓。在他家原已住有三江县的农干杨桂莲和我校老师张晓武。现我与片长又住这里共 4 个工作队员。陈正春为人忠厚老实，一家人对我们非常热情，片长说：“现在才尝到贫下中农的味道。”他楼上有几个房间被火烟熏得乌黑的。住户陈相浓和农干杨桂莲帮我

们打扫了大半天，我们住得还很舒服。

饱尝艰辛的“革命”工作

整个运动经过“三同”扎根，做阶级调查；小“四清”年终分配，组织阶级队伍；大“四清”整党建党，对敌斗争，生产建设，建立社队领导班子等阶段。运动中都是我与秦老师搞片的工作，包括收集整理上报、上传下达、保管文件、工作队的生活管理等，后来我的工作又加上工作队的团支书、农村青年民兵和参与农村党组织整顿。每两天书面汇报一次。由于这里是和平土改，阶级阵线模糊，领导强调，特别要提高警惕。工作队进村搞阶级调查时，由于撇开工作队之外的当地干部，秘密进行，语言不通，只在“三同”户内活动，对周围的人不敢接触，因此，各组工作困难，队员汇报不出多少东西。

12月9日晚9时，片长开会回来，叫我马上通知副片长和组长来开会。他说他要调到七片去，这里由贲政林来当片长。我们都舍不得他走，因为他抓工作中心突出，交代明确，对问题分析透彻，预见性强，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散会后，他单独同我们两个资料员谈了很久，他鼓励我们说“工作没经验不怕，一靠吃透上头政策，二靠密切群众关系，三靠自己动脑筋，有这三条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对我们的教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他要调走了。

新来的片长贲政林是当地一个区委的领导干部，身背一支手枪，约30来岁，会当地语言，有农村工作经验，为人和善，开朗活泼，说话还带有几分幽默。他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信心。

12月13日，队部领导、柳州地委统战部领导庞湛恭来指导工作。他说“工作打不开局面，主要是怕串错门，找错对象，怕犯错误。”“工作队必须打出去，对任何人都要接触，任何事都要过问，要全面了解掌握情况。”又说“民族学院

学生达不到工作队水平，要帮助，工作打不开局面，国家干部先检查，先找原因，学生毕竟是学生，带一、二个月就可以放手了。”领导的指示，给我们启发很大。

资料工作是运动的晴雨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和秦老师每天下午都要到各组去了解情况，走不完晚上就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回来还要整理一天的资料，常常要工作到半夜一、二点钟，眼皮经常“打架”，一闭眼就能睡着。为完成任务，经常要强行睁开重似千斤的眼皮，整理完资料还要记当天的日记，有时实在顶不住，日记放在第二天或第三天补上。第二天一早又赶起做新一天的工作了。

很快到了 1965 年春节，工作队放假七天，其他队员都回家过年。我们八片除留吴国良和同学黄凤祥在村外，其余师生都到古宜过年。1月 19 日师生们到程阳桥集中，准备返古宜，相见时都不约而同地说：“你瘦了”，大家互相拥抱，非常亲热。是的，两个月来，大家未曾见过面，未吃过一片肉，都是糯米饭加酸菜，怎能不瘦。但精神非常饱满和兴奋，个个喜笑颜开。在古宜除了改善生活，参加游乐活动外，又组织学习中央新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进一步明确大“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月 7 日返回程阳驻地，留守的吴国良和黄凤祥都十分高兴地告诉我们说：“这里的春节过得很好，农民都轮着请工作队吃饭，黄凤祥都吃了十一家。”我们也为工作队同群众的亲密关系感到欣慰。

3月初，工作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事情，组长陶叶泰与副片长刘士岳顶撞起来，提出不当组长了。片长问我怎么办？论年龄、资格老陶都比老贾老。我

说：“召开党支部生活会解决。”老贲说：“大家都来自四面八方，各有思想，人心难测，能不能达到目的呢？”最后片长请示了队部政治处，召开了民主生活会，政治处的中南民院院长白瑞西也来参加。片长带头检查自己对下面关心不够，副片长梁浩说：“好话一句人心暖，话不投机六月寒，同志间要多关心，少指责。”陶是自治区统战部的文化专业干部，刘是基层领导干部，刘检查了对陶尊重不够，陶也气消了。白院长说：“这些都是非原则问题，只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谅解，就能团结共事，把工作做好。”由于贲片长考虑全面，起表率作用，会议开得很成功。

运动中期，我的工作更多了，除任工作队的团支书外，还兼管农村的青年民兵工作。这个村的团支部有 7 名团员，党小组 4 名党员，从 1961 年以来未开过会，也未交过团费和党费。有的已忘记自己是否党团员，党小组长是谁也没人知晓，团员已 100% 超龄。我们组织他们学习，肯定他们过去的成绩，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向前。党员要从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工作上进行全面检查，对他们过去的表现和现在的态度都要整理材料，填表上报，然后按党员条件审查登记，报上级党委批准才能承认其党籍。在这个过程中，要组织他们上党课，听群众意见，进行个别谈话，工作量不少。其中女党员杨培红上党课不来，除老郭做工作外，我三次上门找她谈话，她始终不愿继续当党员。最后领导开会，决定取消杨培红党员资格并上报。

6 月中旬，公社政治处又抽我去顶班半个月，我白天到政治处去，晚上回来协助秦老师搞片里资料工作。工作多，任务重，经常废寝忘食，夜间睡眠不足，加上那里没有冲凉习惯，春天转暖以后，一连十把天没有换洗衣服，不料生了虱子，真是很不好意思。等有太阳出时才在“三同”户家烧了一锅开水，把衣

服、被子全部烫洗干净，全身痛痛快快地冲个凉，也许这就是彻底“革命”吧。

乐趣无穷的“三同”

“三同”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入村后过硬功夫是搞好“三同”，取得群众信任扎下根。因此，大家进村放下行李就做好事。我们一个同学到“三同”户见小孩满脸鼻涕就拿手巾帮他洗脸，不料小孩哇哇哭起来。我们的同学说：“不要哭，不要哭。”但学的简单侗语记错了，说成：“不要笑，不要笑。”惹得在场的人都笑起来，连小孩也发出笑声，真是精彩一幕。“三同”除搞家务外，每天上午都要参加劳动，上山打柴或参加田间劳动都可以。由于工作多，不能每天上午都去，但积极争取参加。我除了同杨桂莲给“三同”户上山砍柴外还到各队去参加田间劳动。如捡油茶籽、插田、送肥、植树、修公路、修电站等等，使我广泛接触群众，了解民情，增长见识。

1965年6月8日，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叫“机米”的山冲去插田。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不断地往很陡的山上爬，爬上山顶又走下山峪，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到了田间，看见两个穿新衣裳的姑娘，项上套着四个闪着亮光光的银圈，手上带着手镯。我问社员这两个人是谁？社员说：“这是新娘。”他们这里习惯男女结婚后，未有孩子的女方不落夫家，只是每年插田，收割时到夫家劳动几天又回娘家去了，待生了孩子后才到夫家居住，这又是劳动中的一大发现。这里插田也很特别，是向前插去的，只求横行直，竖行是乱七八糟的，要求 8×8 寸、 8×7 寸的插秧规格根本达不到。老实说，我从小也插过田，按家乡的方法向后退插去，横竖行都能对齐，又能达规格要求，而且比他们又快又好，他们个个称赞说我插得好，要向广东学习。妇女们做田工很慢，十个妇女拔秧，拔了半天，我们几个男人很快就插完了。我按家乡的方法拔给她们

看，她们嘻嘻哈哈都笑我做得不错，田间充满了喜悦。

革命进步的侗族姑娘

我们工作队进村时，经常看到侗族姑娘是排队站巷与隔村来的男青年对唱情歌。随着运动发展，男女青年都积极投身运动，如上文化夜校、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等，很多青年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6月25日县武装部在古宜召开民兵学毛著积极分子座谈会。我们八片原定是陈银伍去的，那时正好银伍到冠洞讲解卫生展览，改由吴培月参加。但到下午时还不见武装部来通知，我匆忙到队部去问，武装部的人说，他们已去了，你们不去也可以。我说：“已经通知做好了准备，失信于民怎么成。”他说：“那明天去吧。”我不满地返回马安，这时，听见对面新开的公路有汽车开动的声音，一看正好有一辆货车从大寨那边开出，我马上跑到培月家，叫她准备简单行李跑步过程阳桥，我先跑去拦车。我拔腿跑出马安飞过程阳桥，货车就到了。我举手示停，问司机能否带一人到古宜参加开会。司机爽快答应，不一会培月赶到，我送她登上司机驾驶室，她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她人生第一次坐汽车，也是第一次从家庭小圈里走出社会。这一切都体现着侗族姑娘的热情、进步和对工作积极负责的精神。

我住的“三同”户陈相浓与农干杨桂莲都是侗族姑娘，我们住在一起，情同兄弟姐妹，象一家人亲密无间。上山打柴做家务基本都由她们做。相浓是16岁的姑娘，年纪不大，却不读书了，她父母在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去世，跟着60多岁的阿公阿婆过日子，少言寡语，现在我们一起生活和劳动，一扫她的孤独感，使她很快成为一位活泼、勤奋、好学的小姑娘，成为我们工作队的好帮手。杨桂莲20来岁，中学文化，一头长发卷在头顶上，额头绑一块约二寸宽的白布带，胸前衣服有块四方型的花纹图案，外套是稍宽的黑色衣裳——一副典

型的侗家女妆扮。一对明亮的大眼睛，显示着纯朴、勤劳和聪明。她不仅为我们翻译侗语，在我工作忙不过来时，还经常帮助到各组去传达精神，收集有关资料。我的一对袜子有点破，请她帮缝一下，她不知从哪里弄来白布，缝了一对几层厚的袜底，针线密密麻麻，非常细致牢固，我穿了很久很久。侗族姑娘的勤劳、朴实和美丽，令我终生难忘。

“四清”工作的后期阶段

1965年5月上旬，运动开始转入组织建设阶段，包括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等。6月13日，程阳公社“四清”工作队在大寨鼓楼集中开大会。由罗杰林（他已任程阳工作队队长）代表工作队做阶段小结。他说：“大‘四清’已经结束，运动接近尾声，工作成绩很大。首先是澄清了阶级混乱现象，分清了敌友；其次是初步解决了干部经济不清的问题，全社229名干部清出工分81511分，现金28788.87元，粮食57828.90斤，茶油2229.80斤，总折款35704.30元。三是贫下中农树立起了当家作主的思想；四是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古宜到程阳的20公里公路已开通通车，程阳公社电站已开始发电。”同时，他宣布了评“五好”工作队员的结果。程阳公社234名工作队员，有47名被评为“五好”队员，有36名受到表扬。评“五好”工作队员是很认真的，我们八片就评了一整天，先是自我总结，然后大家提意见，按条件提出名单，最后经工作队党支部审查通过上报。在这次评比中，我也荣幸地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

程阳电站在6月初就开始发电了，我们把电线拉到各村寨，同时架起广播。每当夜幕降临，电灯亮了，广播响了，整个程阳村寨歌声嘹亮，喜气洋洋，人们欢呼雀跃，寂静的山寨一下热闹了起来。我的“三同”户老大娘举起大母指

说：“赖！赖里哼呵。”（好，好得很呀）还说：“我能听懂汉话就好了。”但运动后期还有许多工作，对敌斗争未开展，农业生产每亩达 800 斤未定论，党建工作未完成，革命化的领导班子未建立，发展党员要求达到人口的 2% 等等。罗杰林要求按中央六条标准抓紧抓落实，并指出领导班子与生产这两条是关键。

6月18日，工作队党委召开程阳、平铺、冠洞3个公社工作队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莫勉真作报告，指出当前要抓好关键性的几项工作，强调对敌斗争要抓得准、抓得狠、搞彻底。建立领导核心要处理好干部问题，团结面要达 95%，搞好新老干部团结，生产要实现大幅度增长。工作队有松劲情绪要解决，要善始善终把运动搞彻底。之后，连续 3 天的上午在程阳公社大寨鼓楼召开有 2000 人参加的大会。分别批判斗争地主分子杨某、坏分子吴某和党内走资派杨某某。来参加开会的群众都穿上新衣裳，特别是青年男女更是大显风采，女青年带上银圈和手镯，面带笑容，如花似玉。大寨鼓楼地方不大，地坪中央放张台桌为会议中心，鼓楼内内外外到处挤满人群，群众情绪高涨，高音喇叭唱着革命歌曲，整个大寨充满了革命激情和团结气氛。

7月1日下午，片长开会回来说，我们学校四年级的同学提前离村返校。我马上一惊，感到很突然，为什么不可以推迟呢？真是舍不得离开啊！接着 2 日就搞鉴定。4 日工作队政治处召集我们毕业班的班干部开会，研究提前返校的事宜，决定由各班党支部书、班长成立队委会领导返校，学院领导与其他同学坚持到运动结束。7 日上午，工作队党委庞副书记、程阳工作队长罗杰林和学院院长白瑞西召集我们毕业班同学开座谈会，表示欢送，他们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并表示感谢。最后白院长说：“学院准备隆重迎接你们。”又说：“大部分同学成绩很大，少数同学做得不够好，个别同学很糟糕，回校要很好总结。”并要求在晚

上开好“三同”户会议，8日早上动身，不准接受礼物，损坏群众的东西要赔偿。

难离难舍的惜别

7月6日上午，天下着雨，路很泥泞，我们再次到程阳电站劳动，再为电站作点最后贡献。7日下午参加青年实验田劳动，挑大粪施田，为达亩产800斤再出点力。当地青年人没挑大粪下田的习惯，都说“臭得要死。”还是我们工作队找来便桶担起来，带动他们一起去施肥。工作队要求亩产不达到800斤不能离村，我们感到任务未完成，多送一担肥算是我们尽一点责任吧。

7日晚上召开“三同”户座谈会，讲明我们明天要走，征求他们给我们提意见。他们感到太突然了，说了很多赞扬的话，说永远也忘不了我们，还挽留我们不要走，走了心里十分难舍。

8日我们一早起床捆绑好行李，住户的老大娘更是早早起床给我们蒸好糯米饭，包好要我们带到路上吃。我们说了很多好话是不能带的，他们哪里听得进？早饭后，相浓与桂莲已把我的行李担到程阳桥去了。等我告别住户阿公和阿婆同片长一齐到达程阳桥时，那里已来了很多人，除了我们马安片外，平寨、岩寨、大寨的群众和工作队也来了，工作队的领导和未返校的同学也来了。当地群众吹起芦笙，放起鞭炮，依依不舍送别我们，程阳桥顿时人头涌动，热闹非凡。这时，程阳桥头的公路上停放着两辆大客车，有些群众争抢着把行李放到车顶上，小件的放到车内，大包小包要给我们送糯米饭，依依不舍讲分别的话，整个程阳桥沉浸在难离难舍的氛围中。我的“三同”户陈正春老人硬要给我两包糯米饭，我同他说了半天，推了半天终于挣脱，但他又托杨桂莲送给我。杨桂莲深情地说：“这是侗家的心意，你无论如何要收下。”并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含着泪水，我不得不收下，我说：“我收下，今后你好好工作，感谢阿公……”

千言万语也不知说什么好。接着老贫农吴成志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两包糯米饭，非要我收下不可，我们又推来推去，最后，我想不收他老人家的也难。随后，一群姑娘又走了过来，说：“老谢呀，你不走好吗？留下最后走吧。”吴培月突然拉住我的手，久久舍不得放下，一时我也不知对她说什么好。她们中有的说：“你以后要记得回来看我们啊。”接着相浓拉住我的手，眼里噙满了泪花，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这小姑娘我们进村时什么都不懂，现在能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默默地祝她进步，前途无量。

道不尽的离别情，说不完的知心话，时间很快到了9点，我们准备上车了。车上原先坐满了群众，他们第一次见到这样漂亮的大客车，都情不自禁地上车坐一坐，摸一摸。当我们学校叫集合时，他们才下了车，在公路两旁排成长长的队伍，我们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程阳公社小学的学生排在欢送队伍的最前面。群众鸣放鞭炮、鼓掌、招手。汽车开动了，再见，再见的道别声在程阳桥头回荡着，也在我们的心脑里长久回荡。

2006年5月8日写于广东连山

三年困难时期

——在泗里公社工作的回忆

凌绍光

在《三江文史资料》第六辑上，张胤同志的文章中讲：“1959年和1960年全县20个公社，有19个公社130多个大队几次断炊”（《三江文史资料》第六辑130页）。但全县有一个公社没有断过炊，这个公社就是泗里公社。

当时的泗里公社，和全县其他地方一样，是按照每人每年400斤稻谷的低指标在公共食堂安排社员生活的。按人定量（劳动力1天1斤大米，老人小孩从3两到8两），分指标到户到人，在食堂吃饭。当时，从小孩到大人，从群众到干部（干部定量每人每月27斤大米指标，扣2斤支援灾区每月只能买到25斤大米），没有一个不喊肚子饿的，但全公社没有因饥饿造成严重水肿和非正常死亡。据当时在公社卫生所的工作人员荣永贤医师、陆玉姣同志等回忆，当时在别的地方因饥饿造成中年妇女严重干瘦而出现了子宫下垂的妇女病，而泗里公社的妇女不但没有此病，而且一些育龄妇女还照样怀孕生孩子。

1959年3月，全县万人核产大会上，县委宣布，将全县10个公社划成20个公社。吉宜公社划出马坪、泗联、泗马、泗里口、头坪、大树6个大队，成立泗里公社，公社设在泗里口，莫翠云同志任公社党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当时核产大会正进入打擂台、报产量高潮，莫翠云同志和我商量，叫我到组织部去要公社干部配备名单，催他们尽快到公社报到。我立即赶到泗里口，一手抓公社筹建工作，一手抓头苗插秧。她继续在县参

加大会，和各大队党支部继续搞核产。

我到泗里公社下乡的第一个大队是头坪大队，和在家的大队干部研究后，决定晚上开社员大会，动员加快头苗插秧进度。有社员提出，插秧劳动强度大，希望给劳动力加些口粮。我找了食堂会计唐永卓（一个年近 60 很会计算持家的老农民），他叫我先找大队保管算算，要是库存粮食能接上头苗还有剩余，就叫他一个劳动力一天多秤 2~3 两米给食堂，食堂可以如数加给劳动力。我找了大队仓库保管员算账，不算不知道，算了吓一跳。按粮食年度（头年 7 月 1 日一下年 6 月 30 日）6 月 30 日前，以现在每天给食堂的发粮数，是可以安排的。7 月 1 日—30 日的粮食，要是收头苗遇上雨天，没法晒干，那就要向国家借粮，否则食堂就会开不起火（断炊）。看来，想从仓库多发粮食增加劳动力的吃饭量，是不可能了。唐永卓向我建议，食堂有茶油，大小人均按 8 斤油留给食堂，光炒菜是用不完的，可挖芭蕉芋（社员进食堂吃饭，不养猪了，以前种的芭蕉在地里，过冬又不烂）用茶油炸酥，加菜给社员（58 年大办食堂时吃饭不要钱，把猪都杀吃光了，春节后食堂再没有加过菜）。他把在食堂种菜的几个妇女安排去挖芭蕉芋，当天就油炸好，发饭给社员时，同时也发给芭蕉芋酥。我把头坪食堂炸芭蕉芋酥给社员加菜的做法，推广给全公社每个食堂，芭蕉芋、红薯、南瓜、芋头等，有什么就炸什么，有些食堂还派人去河里打鱼捞虾来炸酥，农忙一、两天 1 次，农闲就五、七天，最多不超过十天，都要炸一次酥给社员吃。社员普遍反映吃了食堂炸的酥后，肚子没有饿得那么快了。

泗里公社的头苗插秧进度较快，县委农村部天天按上报数字排队，泗里公社都是前三名的。在清明后一两天，就全县第一个插完头苗秧，进入

田间管理。4月中旬末，莫翠云同志和各大队支书从县的核产大会结束回来，全公社已完成第一次耘田。5月上旬，贯彻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信，毛主席讲：“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干部和社员都看到有超产的希望，就大大调动了积极性，耘完二次田，就全面安排专人分片管理（割田基、关牛积肥、放老鼠药、打农药灭虫）。

由于头苗插秧抢上季节，及时进行田间管理和施肥，全公社禾苗生长旺盛，6月上旬已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县委通知莫翠云同志到县委开会，我和她一路看了泗里大队寨头和头坪大队桐叶冷口的一部分头苗，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

莫翠云同志到县开会的第三天，她给我打电话讲：“县委决定在泗里公社开始收头苗时，全县各公社领导到泗里公社参观开现场会，时间暂定7月中旬，具体时间到那时再通知。人数是一个公社两个，加上县委机关及粮食局等部分领导，约七八十人，要做好生活安排。”我讲：“食堂吃饭没问题，就是没东西加菜，食堂养有些猪，而且都是条猪，留过年杀来分肉给社员的，不能动。我听说县油厂工人用生产照明的发电机，到河里电鱼，蛮有收获的，是不是找金化雨同志（粮食局局长），到时叫他帮帮忙。”她讲：“我去找看。”

7月中旬，全县头苗丰收现场会在泗里公社召开，各公社书记、副书记、县直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约100人左右，在泗里大队、头坪大队部分生产队参观。清早，县油厂来了三个工人，他们用小船装了发电机到泗里口，我安排几个抽来帮大会食堂煮饭的社员，拿两条小船和捞鱼工具，

跟油厂工人下河电鱼。从泗里口到石门，一个来回，不到半天就得了 100 多斤鱼，除了给了些油厂工人拿回油厂外，其余全部留作大会加菜。会议两天，餐餐都有鱼吃，参会人员的生活总算有了改善。

会议期间，我向莫翠云同志提出，7 月下旬要是天气不好，头苗谷晒不干，一部分食堂的口粮可能接不上，要她向县粮食局借 2 万斤粮食指标，到那时哪个食堂接不上，就来借，头苗谷晒干了就如数归还。后来，由公社办公室主任杨佐出面，找来参加会议的县粮食局荣永中副局长，他答应借 2 万斤指标，由他直接和泗里粮所所长曹辅祥讲。7 月上旬，部分大队到粮管所借粮，到 8 、9 月头苗谷晒干，所借的粮食如数归还粮所。

7 月 20 日前后，全公社进入双抢大忙，劳动强度大，食堂没有猪杀来给社员加菜，只好用茶油天天炸酥给社员吃。双抢进度全县排队都在前三名以上，7 月下旬头苗全部收割完，二苗在立秋前全部插完。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田间管理，9 月底除了留少部分劳动力继续田间管理外，所有劳动力全部转入铲茶山。公社提出，为了超额完成茶油统购任务（泗里公社是茶油产区，每个大队都有茶油统购任务），留足社员口油（当时的政策是完成统购任务后，社员口油可按人均 7 斤、8 斤留，不完成统购任务的，按比例减下来），也为年终分配有钱兑现（杉木、楠竹很少，年终分配主要靠卖茶油来兑现），一定要把茶山铲好，不丢荒一块茶山。

白露白茫茫（禾苗抽穗扬花），寒露满田黄。这是三江历来种一苗时的禾苗生长景象。以往的生产习惯是霜降前铲完茶山，霜降后剪禾把，剪完禾把拾茶籽。泗里公社大部分田都种两苗，边远的山冲田种中稻，也是应该在霜降前后收割的。

为了了解中稻的成熟程度和收割情况，我走进了桐叶冷（头坪大队耕作区）直到冷脑，那里的中稻都已成熟但未收割。为了节省走路时间，下午赶回公社开电话会，我翻杉木山的一条小路，过大粪塅（那里有中稻田），爬到半坡时，我左脚踩入用树叶杂草盖住的一个坑。“啪！”的一声，我往地下看，一个装野猪的铁夹正夹在左脚眼（脚踝）的上部，一根 8 号铁线把铁夹联绑在一棵树上。我把铁线解开，再用我带的驳壳枪杆插入铁夹，想把铁夹撬开，把脚抽出来，哪知不但撬不开，反而夹得更紧，把我痛出一身汗，我只好大声呼喊，因山高林密，没有回应，我只好一边打枪一边呼喊（后来听当时过凉亭坡的人讲，只听到枪声，没听到人喊声，以为是农民打野猪的）。在冲底割田基的两个农民，因为他们是在冲底，枪声和喊声都没有听到。我将装入驳壳枪的 7 发子弹打完，外面一点回音都没有。我只好用双手捧着铁夹，坐在地上，一寸一寸的往山下挪。待我挪到山脚时，太阳已下山了。离我 100 多米远的山棚有两个绹牛（圈养牛）的社员，刚吃完饭，在乘凉。一个先看见我，指着我的方向对另一个社员讲：“那不是凌书记吗？”两人就急急忙忙跑过来，看见我坐在地上，左脚夹住个大铁夹。一个社员跑回工棚拿来两把柴刀，一个用一把柴刀插入铁夹两头，想把铁夹撬开，把我的脚弄出来。结果撬不动，只好把我扶进工棚。一个人陪着我，一个人到一里多外的大粪塅，那里有一社员在绹牛，他会装铁夹，叫他来帮打开铁夹。他来了之后，找来一根柴杠，把柴杠中间压在铁夹开关把上，一个人扶着我，两个人用脚踩上柴杠的两头，铁夹打开了。扶着我的社员马上把我的左脚从铁夹中拿出来（这时我的左脚已麻木，不能动了），他们对我讲：“好彩啊！脚骨不断。”这时，天已黑压压一片，他

们三人，一个拿火把走在前面，两个人扶着我，一步一拐地把我送回公社。到公社时已是晚上 9 点钟，我要公社食堂煮饭给他们吃，他们不肯，讲不饿。其实是饿的，按当时大队的规定，劳动力一天吃 1 斤米，住山棚、绹牛的，加 2 两，一天 1 斤 2 两米，分三餐吃，一餐 4 两，哪有不饿的。他们不肯吃，是怕我们干部低指标，没有多余的粮，推辞而已。公社办公室的杨佐同志和我爱人赖冰倒水给他们喝，他们也不喝，讲这里的水没有山里的井水好喝，他们连坐都不肯坐，就离开公社办公室，出门回山去了。后来，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去酬谢他们，数十年过去了，往往想起，觉得对不起这三个纯朴的老实农民，总感到欠他们的。

回到公社后，公社卫生所的医生荣永贤同志知道我受伤，立即赶来帮我把伤口冲洗消毒包扎，给消炎药我吃，打破伤风预防针。这时已十点多钟。在县里开会的莫翠云同志打回电话，问下午三点开电话会的情况，杨佐同志把我在山上挨野猪夹夹脚，才回到公社，下午电话会没法开的情况告知她，她除了向杨佐反复问我的伤情以外，还叫荣医师跟她讲话。她又详细问了我的受伤程度，嘱咐荣医师要处理好伤口不受感染。她当夜就找到了古宜公社党委书记罗耀辉，请他给光辉大队打电话，叫光辉大队派人到桐木屯，请那里两个治跌打损伤有名的草医，到泗里公社给我治脚伤。第二天上午，桐木屯的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医师带了草药（有煮水洗的、泡酒吃的），到泗里公社给我治脚伤。荣医师继续给我打针吃药，一个星期左右，我的脚已消肿，伤口愈合，能下地撑拐棍走路了。

进入秋收大忙季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秋收和年终工作，党委分工，我脚伤未完全好，由我在公社和杨佐抓面上工作和年终分配，莫翠云同志

和刘玉章（副社长）到各大队检查督促。泗里公社的秋收进度，在全县 20 个公社中，是第一个完成二苗收割和平谷入库的。我根据各大队平谷入库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计算，除按人均 400 斤谷留口粮，留够种子，头坪、泗联两个有猪场的大队按每头母猪留 200 斤饲料粮外，部分有公粮实物任务的大队交完公粮（泗里公社是山多田少的茶油产区，个别大队有部分公粮实物任务，其余都是卖茶籽茶油时用现金代交公粮的），还有 16 万多斤粮食。我和莫翠云书记，刘玉章、杨佐两个委员交换意见，按年头宣传贯彻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信中所讲的“一定要有储备粮”，这 16 万多斤粮食就全留在各大队，作为储备粮，他们都同意。1960 年上半年，全县粮食严重紧缺，7 月 1 日起的粮食新年度，粮库无粮可借，这 16 万斤储备粮起衔接作用，保证了食堂不断炊。

1959 年是泗里公社油茶结籽的丰收年，各大队都超额完成茶油交售任务，按照多卖油多留口油的政策，各大队都可以按人均 8 斤以上留口油。按食堂吃饭老小口平均留油 8 斤以上，可以保证食堂天天有油炒菜，还可以三五天、十天八天炸一次酥给社员吃，当时已无猪可杀，炸酥就是给社员加菜，这是办食堂的好办法。

茶籽捡完三道后就放浪，社员可利用出集体工收工后的时间或假日去腊（音，方言，即扫尾的复捡）茶籽归己，可以拿去油榨换油，也可以卖给粮所要钱。学校教师除用劳动课时间带学生去腊茶籽作勤工俭学收入外，老师在星期天可以和街上非农业人口一样，上山腊茶籽。泗马大队显塘 1 队的队长杨华成向我建议，挖茶山地内或茶山地边附近的老鼠洞，按他的经验一个老鼠洞得三两斤茶籽是常有的，有时五六斤都有。我觉得是个好

主意，把腊茶籽与灭四害结合起来，一举数得，就向全公社推广。我爱人赖冰在泗里中心校工作，每年茶山放浪后，除带学生勤工俭学腊茶籽外，星期天中心校的十多个老师，都去腊茶籽换油来分，我爱人每年都分得七八斤茶油，后来四清时，作为多吃多占，全部按粮所收购价折款退赔。

1960 年元月，莫翠云同志调到县委工作，3 月我出席县委召开的党代表会议。大会套小会，在县委二楼会议室，县委书记李春旺主持会议，主要汇报去年年终分配和今年生活安排。我汇报泗里公社茶油统购，个个大队都超额完成任务，有公粮实物任务的队，公粮如数入库完毕，公粮交代金的，在卖茶籽、茶油时，都如数交够了。人均口粮按 400 斤安排，留够种子，两个有母猪的大队，每头母猪按 200 斤饲料粮的标准也留足了。全公社还有 16 万多斤粮食（李春旺书记认真记录，脸带笑容），全部留在各大队作储备粮。李书记停止记录，把笔记本和笔用力一推到桌中间，板着脸瞪眼看我，一言不发，全场鸦雀无声，在会上的其他公社书记都转脸看我。停了一会，其他公社才继续汇报。会后，一些好心的同志来对我讲，李书记发火了，你赶快去向李书记认错，吴县长（仕德）已带人去湖南挑粮，你还留什么储备粮，赶紧把 10 多万斤粮食调出来，不然的话，你这个副书记就当不成了。我想，毛主席在给六级干部信中讲的：“一定要有储备粮”，我照做了，有什么错，副书记不当就不当。第二天在大礼堂开总结大会，大会将结束时，县委宣布，撤销泗里公社，原泗里公社六个大队，划回古宜公社；从古宜公社划出大竹大队、大洲大队和古宜镇成立城关公社，调我任第一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1960 年冬，姜肇初同志来三江当县委第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在古

宜公社、城关公社搞试点，贯彻中央十二条，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瞎指挥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1961年元旦前，这两个公社的整风整社结束。县委宣布，撤销城关公社，恢复泗里公社，李恩先同志任泗里公社党委书记，我为副书记。李恩先同志即到泗里公社主持工作，县委抽我到八协公社整风整社，任工委副书记（兰永森为书记），带领县直机关干部潘德亮、郑焕、吴英俊、梁族骥和文工团的一部分团员共30多人及几个地区卫校来的医务人员组成工作队来到五风较为严重、已经出现社员非正常死亡的唐朝大队，搞整风整社。

1961年4月，整风整社工作结束，我回到了泗里公社，当时的泗里公社，虽然没有严重水肿病人，也没有因严重水肿非正常死亡的病例，但由于长时间的低指标，社员体质下降，一些大个子或饭量大的劳动力社员，也出现了轻微水肿现象。按县委指示，凡水肿病人，都要集中治疗，补充营养。经公社党委（书记李恩先、副书记凌绍光、委员兼武装部长许憾怀、办公室主任杨佐）研究决定在公社种养场（在公社对河，是1959年借一座没人住的空木房办的）办病院，抽调泗联大队的老党支部书覃日辉来负责，每个大队抽一个劳动力（由大队记工分）来种菜砍柴煮饭，由公社卫生所的医务人员下各队检查，确认为有水肿的，立即集中到公社病院来疗养。口粮由所在食堂发给带来，劳动力1天1斤大米，非劳动力8两，公社1个人1个月补助1斤茶油3斤黄豆15斤大米。覃日辉同志向我建议发给民兵的步枪留两枝及一些子弹放在公社，社员上山发现野猪来报，他就带人去打。一年间，也打得几次野猪，每次得野猪除病院工作人员及住院人吃外，还送一些给公社食堂。

1961 年的五六月间，县粮食局副局长吴家业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泗里公社，调查准备解散食堂的事。公社党委几个委员都想不通，不是讲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萌芽吗？几个月前党中央发的整风整社文件（中共中央 1960 年 11 月 3 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中，就有一条讲“办好公共食堂”。现在粮食指标这样低，把粮食发到户，一个月指标 20 天吃完，还有 10 天怎么办？吴家业讲，是县委要他们下来调查社员意见的，工作组到下面去听社员的意见后才回来向公社领导汇报。他又个别同我讲，上面有解散食堂的指示，我知道他指的上面，肯定是党中央有文件到县委了，有新的精神。吴家业和他带的工作组到下面调查两天后回来讲社员普遍希望解散食堂，还讲“粮食分到户吃饭有把握。”公社党委当时就研究决定，收头苗谷晒干后，就按各户人口的口粮定量，称谷给各户社员，社员全部在家煮饭。办了两年多（从 58 年下半年算起）的公共食堂，就这么一句话全解散了，这是顺民意啊！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 1961 年 3 月 13 日在《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一文中讲“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254 页）

食堂解散了，口粮分到户，社员在家煮饭吃，普遍要求养猪。但市场没有猪崽卖，就靠当时大队的集体养猪场保留下来的母猪养崽，按生产队

社员户数排队分给社员。到 1962 年底，头坪 180 多户，家家都有猪养了。全县第一个恢复户均养一头猪。据县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办食堂前的 1957 年全县 38842 户农户，年末生猪存栏 47621 头，户均 1.2 头，办食堂后的 1961 年全县 41031 户农户，年末生猪存栏 8030 头，户均 0.18 头，6 户社员才有 1 头猪；1962 年全县 40090 户农户，年末生猪存栏 16287 头，户均 0.4 头，3 户社员有 1 头猪，全县生猪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到 1965 年全县 40685 户农户，年末生猪存栏 44667 头，户均 1.1 头，基本恢复到办食堂前 1957 年的水平。

1962 年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由县委第一书记姜肇初传达中央 7000 人会议精神，贯彻党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恢复行政区，撤销大队一级组织，以小乡设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8 月，我接县委通知，回县税务局工作。

泗里公社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出现严重水肿病人，更没有由此产生非正常死亡。这得益于泗里公社既是产粮区，又是产油区，保证每个社员每天都能吃到一定数量的茶油。另外，粮食虽然是低指标，但保证不断餐，这就保证了社员不因挨饿而发生死亡事件。

2009 年 9 月

富禄“三月三”民族传统花炮节

赖守基

侗乡一年一度的花炮节久负盛名，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举办花炮节的有

10 余处，其中尤以富禄“三月三”民族传统花炮节为最具代表性，年年举办，代代相传，中外驰名，久盛不衰。

富禄镇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西部 65 公里的溶江河畔，南与融水苗族自治县毗邻，西北与贵州省从江县和黎平县交界，是县境溶江流域第一大镇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侗乡花炮节活动胜地，抢花炮活动已有一百余年悠久历史。

相传清光绪初年，富禄初具城镇规模，开发此地的粤、桂、湘、黔、闽五省志士仁人，为繁荣集市贸易，增进民族往来，弘扬民族文化，以纪念“三王神”为名，于三月初三，举办“赶庙会”抢花炮会期活动。抢花炮地点，开始设在“三王庙”周围，即今富禄乡卫生院空旷草坪，活动中心设在“三王庙”。民国十七年（1928 年），将“三王庙”改建为富禄小学后，抢花炮活动中心及赛场，即移至广阔的河滩上，一直沿用至今。

“抢花炮”是一项民间体育运动，是进行拼体力、斗智勇、赛协作、比速度的强身健体活动。抢花炮运动健儿，由各村寨身强力壮的青年自行组成，每队 10 至 20 人（队员上场一般 10 人为 1 队），每年参加抢花炮的运动健儿有 200 至 300 人。上场穿短裤，内衣，抢时可以挤、扳、钻、护、传、拦，但不准拳打、脚踢，不准身带铁器、利器，如有违反，即取消该队的比赛资格。花炮分头、二、三炮，用三个特制的铁环，直径分别为 10 公分，外绕五彩花线，以铁炮座充火药为冲力，当抢花炮开始，鸣鞭炮一周，指挥员一声哨响，“轰”的一声，炮点响了，一股浓烟冒起，铁炮把套在炮口上象征吉祥的铁环冲上高空，快落地时，各队运动健儿蜂拥而上、奋勇争夺，顿时扭成一团。随后，时而分散，时而成团或分为几团，快速地或聚或散。围观的群众，一层又一层，好似一堵堵人墙，看不清铁环究竟握在谁的手里，场面十分激烈壮观。经过顽强拼搏，直到获炮者机智地避开各道阻挡或在本队友的掩护、传递下，顺利地将铁

环交到指挥台，待裁判员鉴别真伪后并宣布铁炮真实有效和宣布优胜队名、获炮者姓名后，争夺方为结束。接着依次燃放第二炮、第三炮（习俗只放三尊炮）继续争夺。抢花炮结束，获炮队将获得具有民族特色的五彩缤纷的“花炮台”及数额不等的奖励物品（曾奖给黄牛、生猪、彩电）和奖金。获炮队等到次年“三月三”到来之前，须复制一新“花炮台”送还富禄“三月三”民族传统花炮节组委会，名曰：“还炮”。

“花炮节”举办初期，组织者把“花炮”寓意为：抢得头炮者，“福禄寿喜”；抢得二炮者，“升官发财”；抢得三炮者，“人丁兴旺”。解放后，经过党和政府的引导及提倡，剔除了封建糟粕，保持和发扬健康向上的民间体育运动内涵，即依第一、第二、第三炮排列名次，沿用下来。在“文革”期间，抢花炮被列为“四旧”禁锢了十多年，1980年，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贯彻落实，从此得到恢复并不断创新发展。是年，“花炮”曾象征性的命名第一炮为“团结炮”；第二炮为“幸福炮”；第三炮为“胜利炮”。

富禄“三月三”按当地民俗称为“会期”，“会期”顾名思义就是“聚八方客，招四面财”的聚会日期之意。除了“抢花炮”为最大最吸人眼球的节目内容外，还有商贸交流、游览观光、器乐歌舞、交友恋爱等等。历年来，桂、黔、湘三省交界方圆百里的乡镇、村寨，各族人民（包括商人、游客）从四面八方云集富禄镇，每年少则3至5万人次，多则7至8万人次。街道上，河滩上，码头、溪边、草坪，人山人海，川流不息。许多身穿民族盛装的侗、苗、瑶、壮族男女青年，成双成对聚集此地谈情说爱。最惹人注目的是侗、苗姑娘的节日打扮，银头簪、银项圈、银耳环、银手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围胸的领口，对襟衣的衣襟，精心绣饰着五彩花纹图案；精绣的花鞋，精工折叠的裙子等等，所有这些艳丽的装饰，外加美丽的容颜，使得少数民族女子光彩夺目，不时引得路人驻足入神。老年人聚集在山坡上，树荫下，斗鸟取乐，畅谈家事，安度

晚年。商业一派兴旺繁荣景象，大街、小巷、河滩、码头、路旁、草坪，摆着密密麻麻的货摊，秀丽的民族服饰，精美的工艺品，还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此外，各类民族食品小饮食摊点随处可见等等，让人目不暇接。河滩上，柳树坪，还举行赛火铳（即粉枪或鸟枪），赛芦笙，演唱侗戏、桂戏达一月之久。

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是改革开放后的 1986 年，区内外前来观光的游客达 10 万多人。商业贸易也是前所未有的，销售额达 1000 多万元。是年，国外游客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和港、澳、台同胞，不远千里，飘洋过海，兴致勃勃地赶来这里观光。文体表演项目多姿多彩，除抢花炮外，还演出桂戏、侗戏、表演木叶对歌、多耶、踩歌堂、芦笙舞、琵琶歌、笛子歌、粉枪射击、舞龙狮、焰火、篝火，同时开展斗鸟、篮球赛等等。河滩上，公开放映电影、录像通宵达旦。规模之大、来宾之广、人数之多、商贸之旺，为往昔所不及。节日这一天，把这个人口不到 3000 人的山庄小镇，装点成歌舞的世界、欢乐的海洋。

百年来，富禄各族人民举办“三月三”花炮节承前启后，代代相传并不断创新发展。党和政府对此也极为关心、支持。1981 年，在内蒙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抢花炮”纳入了国家体育运动项目，富禄推荐王仁生为“花炮之乡”代表，参加本届盛会。1986 年和 1991 年，分别在新疆和广西举行的第三、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富禄接着推荐张燊忠为“花炮之乡”代表，参加这两届盛会。由朱明先、赖玉琼夫妇精工扎制的五彩缤纷且极具民族特色的“富禄花炮台”被选送并闪耀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会场上。在河池举行的广西全区少数民族运动会，富禄选派出吴启小、廖家祥等 10 名侗、苗族青年，组成代表队参加“抢花炮”，为三江 32 万各族人民争得了名次，赢得了荣誉。从此，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到富禄来摄像、观光。每到富禄“三月

三”期间，在摩肩接踵的人海里，“红发碧眼”者随处可见。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央及广西区内外不少电视台、报社、出版社、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摄影爱好者、作者，年年到富禄观摩，采写新闻、制作节目；中央、中南、广西民族、艺术院校师生，多年到富禄采风、摄影、绘画；《民族画报》、《侗乡风情录》及区内外不少书刊、画报，刊载了富禄“三月三”民族传统花炮节壮观的场面及民族风情迷人的镜头；国内外许多民族学院教授、专家到富禄进行研究；广西、广东、福建、中央等电视台，到富禄拍摄“三月三”花炮节盛况，纳入《珠江情》、《一方水土一方情》、《乡土》等专题栏目，向全区、全国乃至世界各国播放；中国电信在互联网上现场直播“2007年富禄‘三月三’民族传统花炮节实况”。如今，富禄“三月三”民族传统花炮节，情系四海，誉享五洲，风靡世界。

三月侗乡春意浓，凤凰飞翔苗岭中；

歌舞世界欢成海，催开满山杜鹃红。

2007年7月5日

三省人民团结协作的丰碑 ——记大塘坳水库施工

梅 岭 文/图

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三省坡上，镶嵌着一座204万立方米库容的水库，称大塘坳水库。它是三省区毗邻村寨人民团结战斗的结晶，在竣工庆典上各方

一致同意命名为“团结水库”。水库不仅解决毗邻大队人畜饮用，灌溉良田，还可大搞种养，开发旅游，游客上山观光感叹不已。誉为“人造天湖”的“团结水库”为周边群众脱贫致富发挥了作用。

辛酸混沌的历史

水库的旧址是大塘坳，这里有一股水桶粗的喷泉，一年四季涌流不息。在喷泉边形成一个深塘，人称“仙人塘”，塘里有肥得流油的鲤鱼和镰刀柄粗的泥鳅，人称“仙鱼”。传说：有一天一过路汉子，抓了一条泥鳅准备在塘边烧吃，刹时，风起云涌，天色骤变，雷雨交加，塘水暴涨，鱼未吃上，山洪就把汉子卷走了。往后，每当阴雨之夜，塘里水鬼出来，一面戏水一面啼哭，哀切之声十里可闻。传说是可怕的，而活生生的事实却叫人毛骨悚然。这里是广西通往湘黔的古道，解放前，商人在此常遇蒙面匪盗抢劫、关羊（绑架人质），稍不如意白刀进红刀出，一具具尸体浮在塘里，人们对“仙人塘”望而生畏，塘里的鱼不敢吃，水不敢喝。民国 32 年（公元 1943 年）2 月独峒乡林略村背通向湘黔的古道边立有石刻告示，文曰：

值此国难时期，治安尤应关心，
此道毗邻湘黔，深山林密难巡；
近年来如珠贵，难免歹徒乱行，
关于大塘一路，良莠难以查明；
商人经过此地，早黯切莫前行。

告示让大塘坳更加蒙上了一层既恐怖又神秘的面纱，因而对仙人塘的喷泉，人们望而却步，不敢妄生他念。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仙人塘的喷泉都在白白地流淌……

破除迷信建水库

1968 年，庆祝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锣鼓敲响了整个独峒公社。有人大胆提议要在“仙人塘”上修建水库，为三省人民造福，此提议得到毗邻大队的响应。经测量设计后，于 1969 年 9 月，调集近 3000 民工在高山上安营扎寨，宣誓向“仙人塘”进军，沉睡千年的仙人塘沸腾了。在气候恶劣、山高路陡的三省坡上，全靠人海战术蚂蚁搬山的精神，锄挖肩挑削平大小山头 20 个，挖土方 21.57 万立方米，开石方 1.47 万立方米。特别是修筑大坝，在无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为保证质量，民工由山下一担担把水泥、石砂挑上山，铸制大圆滚筒前面拉后面推，一层层把大坝压实。1974 年 4 月，经 3000 多民工苦战五个冬春，在高山之巅、云海之上，大塘坳水库终于奇迹般地全面竣工了。该水库投入工日 70.3 万个，投资额 35.44 万元，堤坝长 195 米，高 33 米，厚 15 米，总库容 204 万立方米，坝面水域宽 1.5 平方公里，受益面积达 2480 亩。在庆典会上，周边村寨的群众敲锣打鼓涌上海拔 1040 米高的三省坡，因水库是解放思想团结奋斗的丰碑，一致要求命名为“团结水库”。从此，一个响亮的库名，传遍三省坡的村村寨寨，载入光辉的史册。

天湖美景人人夸

水库建成效益显著，使周边梯田灌溉不愁，近 3 千亩旱田变水田，解决了人畜饮水，又大搞种养开发和旅游。游客登山观光，每当登上坝首，只见云在脚下过，雾在头上飘，仿佛置身于天上仙境。水库像座高高的水塔居高临下，37.5 公里的三面光渠道，缭绕在无数山梁上，蜿蜒伸向四面八方，像红线穿珠，似长藤结瓜，山光水色尽收眼底。春天，水库四周山花怒放，湖水青青波光粼粼满湖清香；夏天，凉风徐徐拂遍全身，尽享大自然“空调”的惬意，忘掉酷

署的煎熬，忘掉城市的喧哗，回归大自然的快感油然而生；呜鸣！汽笛声响，机帆船从坝首驶来，划破湖面，美不胜收。在这高山岭顶，全区最高的水库，虽无名山之誉却自成景观，文人墨客赞叹不已，作诗曰：“登上大塘坳，胜入九重天；天湖映翠绿，鱼儿舞翩翩。”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得以实现，当年民工不知洒下多少血汗，才换来今天的“天湖”美景。

三江抗美援朝运动

吴炳金

1950 年 6 月 25 日，美国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北朝鲜，朝鲜内战爆发。接着，美国又把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9 月 15 日，美国纠集 15 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仁川登陆，入侵朝鲜。同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轰炸我国丹东等地，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政府根据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志，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10 月 19 日跨过鸭绿江。

10 月下旬，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成立三江县抗美援朝分会，县长何俊任会长，副县长莫虚光任副会长。分会下设代表会和常务委员会。代表会由党、政、军、机关团体和区、乡、村群众代表 36 人组成，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区、乡两级也相应建立抗美援朝支会，组建宣传

队。三江当时正处于剿匪的艰难时期，县人民政府从古宜撤下丹洲后，土匪占据县城古宜，成立土匪政权，与新生的人民政权相对抗。驻守三江的 438 团 3 营，因部队集中兵力进行柳南重点剿匪，撤离三江，另调 2 营 5 连（后换 3 营 9 连）留守三江。年底，一野 186 师开展“黎、榕、从合围”，557 团绕道三江围歼杨标股匪和石竹修股匪，重创古宜匪据点后，也于春节后奉命抗美援朝。三江匪势又猖獗起来，聚集三江的武装土匪一时达 1500 余众。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集团时常派遣特务潜入三省交界处从事颠覆活动，他们大肆造谣：“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央军包围南宁了！”“黄杰率 30 万人挺进镇南关了！”“胡琏兵团进占福州了！”“飞机到柳州轰炸了！”等等，妄图动摇人民群众剿匪的信心和支持抗美援朝的决心。县委和抗美援朝分会顶住逆流，着重抓了三项工作：一是广泛开展镇反和剿匪肃特活动，消灭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社会基础。在部队集中兵力到三江重剿前，三江军民团结一致，与土匪武装进行了一年多的拉锯战，始终将土匪压缩在古宜一隅及少数乡、村，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二是积极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在人民政府领导的区域内，结合剿匪和减租退押工作，举行游行集会，并在公共场所以黑板报、墙报、快报、散发资料和组织宣传队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美国为什么要侵略朝鲜？认清美国的侵略本质；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提高对抗美援朝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目前抗美援朝的形势和我们应做的工作；提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树立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各团体、各行业、各乡、村都制定了抗美援朝行动计划，订立爱国公约，

做到“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粮出粮”，全力支援抗美援朝。三是发动青年、民兵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支前。同时，在广大群众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打败美帝野心狼》、《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和《国际歌》等歌曲，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消除恐美、亲美、崇美思想，增强仇美、蔑美、鄙美的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掀起捐献热潮。各族群众怀着刚刚解放的喜悦心情，以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和蒋介石集团进行颠覆活动的仇恨，开展反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将增产和节约的钱粮捐献抗美援朝。

1950 年，原分配三江捐献 3 万元用于购置武器，后因中央有少数民族不作捐献的精神，加之三江又发生匪乱，因此改为“二万元的努力目标”。由于各族群众爱国热情高涨，至年底，各族群众在完成 480 万斤公粮的基础上，为抗美援朝多交爱国公粮 18 万斤。捐献购置武器款 2.34 万元。400 多名青年、民兵报名参加志愿军，首批入伍 100 多人，其中 50 人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柳南剿匪胜利后，剿匪部队集中兵力会剿柳北股匪。1951 年 4 月，历时一年多的三江剿匪斗争胜利结束。5 月 1 日，剿匪部队和机关干部、群众在县城举行“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游行示威。5 月底，三江召开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总结剿匪斗争、抗美援朝和发展生产问题。6 月，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号召：“各界爱国同胞，开展爱国的增产、增收和节约运动，用增加和节约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优待军属、烈属。”7 月，三江召开第四届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研究生产度荒和抗美援朝及肃清散匪

等问题，县长何俊代表县委和县抗美援朝分会在会上作关于抗美援朝专题报告。他在阐述抗美援朝的意义和形势后，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继续开展捐献活动；响应祖国的号召，踊跃参军支前；优抚志愿军、解放军及革命烈士家属；完善乡、村爱国公约；发展生产，多交爱国粮。会后，全县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的新高潮。比如，敲锣打鼓给军属、烈属送光荣牌匾；为军属、烈属送柴、挑水、代耕帮种，把志愿军称为“最可爱的人”，逢年过节对军、烈属进行慰问；各团体、各阶层、群众和家属都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寄慰问袋、慰问品。至 1951 年 5 月，全国各地寄给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 77 万慰问袋和 120 多万件慰问品和数百万慰问信中，有三江人民的情份。各级学校也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群众捐献和青年、民兵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形成高潮。

在三年的抗美援朝中，全国掀起 4 次参军热潮，出现父送子，妻送夫，兄送弟的感人场面。三江报名参军的青年、民兵达 2000 多人，入伍入朝参战 300 人，为抗美援朝牺牲 13 人。全县共捐款 20 多万元，多交爱国公粮近百万斤。

2008 年 4 月 20 日

丹洲古城概略及地图碑考述

刘汉忠

古 城 概 貌

丹洲村是三江侗族自治县丹洲镇的一个行政村，位于三江县南端，东南接融安县，西连融水县，处于融江江心岛上，四面环水，围如玉带。民国《三江县志·名胜古迹》对此地景致，有“每月夜登楼一望，澄空如练，潋滟波光，亦一胜概也”之说。村落所在地为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年）迁建于此的柳州府怀远县治，距今遥遥四百余年（1914年怀远县改称三江县，1932年县治迁往古宜镇）。现今古城尚存北门及与之相连的一段城墙、东门、闽粤会馆、丹洲书院，还有错落分布的古民居等历史遗迹。这些历史遗迹所蕴含的浓郁古韵，以及洲岛上大片柚子园林散发的田园风味，日益吸引着众多游客闲暇的步履。目前，丹洲古城为三江县文物保护单位，丹洲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怀远县治原在三江口的老堡，因社会动荡，县治几经残破，官无所居，于万历十九年迁县治建于丹洲（时称丹阳镇）。主持修筑者为时任怀远知县、福建晋江举人苏朝阳。县城兴建“经始于万历十九年辛卯四月二十日，落成于壬辰年四月十四日。至于学宫、坛庙、衙宇，凡皆悉备，则癸巳年冬十月也。”怀远县城修建留下了一批记述翔实的文献，具见于汪森《粤西文载》、乾隆《柳州府志》、嘉庆《广西通志》及民国《三江县志》等。

民国《三江县志》卷三《政治·建置·廨署》对明代怀远县署、守巡道分司、学宫明代三大建筑体的描述，可见当时建筑之恢宏格局：

旧城署，在丹洲城正中，明万历间知县苏朝阳鼎建。署之大门中楣，

南向匾曰“怀远县”，北向书曰“召南首瑞”，东、西两间墙外缭以栏干，匾曰“旌善亭”、“申明亭”。中竖“谕官守”、“谕新民”、“谕瑶”、“谕赌”、“谕酒”、“谕斗”四牌。内为把门、皂隶房。大门之东为积仓，凡六间；西为监，凡三间。第二门为仪门，及东西角门，并为三门。又角门东为土地祠，西为寅宾馆，其中为甬道，道上设戒石亭，额以金书，刻圣谕其上，向内书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向外书六训，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亭之上为月台，上为正匾，曰“抚字堂”，堂之东西为龙亭，仪仗库，为耳房，库堂下西廊，为六房堂，左隅为典史衙舍，堂后为川堂，有过屋，有间墙，内有甬道，甬道上有“四知堂”，堂后有庭除，后两廊为厨房，盖规模壮丽，期在一劳永逸，暂费永宁云（录旧志）。

守巡道分司，在旧治丹洲县署西，明万历间知县苏朝阳建。前为大门，次为仪门，直上为甬道、月台，为大堂，匾曰“保厘堂”，堂下两廊，为吏书门皂房，后堂为川堂，为目公堂，堂之东西为官房，堂北开中门，北向有廊，四窗轩豁，规制在边邑颇觉弘敞（录旧志）。

学宫，在旧治丹洲。明万历间知县苏朝阳建。文庙在县治东，前为棂星门，门之内为泮池，越池而上，为戟门，戟门之内，为广庭，庭分两阶，由两阶而上，为露台、为先师庙，上书“大成殿”，两旁为东西庑，庙之东为儒学门，可行数十步，分东西两门，曰礼门、曰义路，由礼门、义路稍迤而北，为中甬道，上为月台，台上明伦堂，堂隅四壁，刻朱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堂下两廊，为东西斋，堂之后，为启圣公祠，为乡贤名宦祠，堂之东西，为教谕、训导廨，栋宇崇隆，美轮美奂，学宫至是庶

几称大观，堪永垂云（录旧志）。

明城的“周围城垣，计三百三十九丈，下甃石奠址，二尺入土，一尺出地，自址至堞，高一丈七尺，堞凡四百五十。辟四门，门各有匾额。东门曰欢雷，楼曰就日，南门曰丹阳，楼曰薰风，西门曰新良，楼曰太白，北门曰治定，楼曰向宸。”又“城外筑土城六百丈，开四门，瞭望楼于其上。”

（民国《三江县志·建置·城池》）。

西门、南门在上世纪 70 年代尚存残址，现已无痕迹。

保存下来有北门（治定门）及一段与之相连的城垣。明代始建北门时另筑有月城（南门亦有）久已毁。城垣原为内外砖砌中间填土，见于余立《复怀远县治碑记》的记载：“高一丈六尺，厚四尺，下奠以石，上甃以砖，内饰土。”但现仅存外墙一面，且墙垣自上而下（含堞口）已拆毁一部，故高度、形制已非明代原貌。门内建有碑廊，收存清代、民国时期的碑刻十余件：《书院碑记》（道光三年中秋立）、《重修文庙碑》（道光二十七年孟春下浣立）、《义会碑》（咸丰三年立）、题残碑（光绪四年仲秋月）、《柳州府告示》（光绪四年十月初八日立）、《重建西厢福德祠碑记》（民国 13 年 4 月立），题残碑（民国 23 年 3 月 30 日立）、《丹洲防火会碑序》（附刻《丹洲防火会乐捐芳名》，民国 24 年 2 月 24 日立）。此外尚有数件已文字漫漶，难以辨识。碑刻内容多关乎城市公益事业兴办、公共建筑兴建等。

旧城垣或官署机构的隔墙尚有一些残存片断，如武庙存外墙一段，又有因为民居所利用而存残希。散存的古建筑部件如石柱、石础等，工艺颇精美，也时见散存于民居。又见文字碑刻或用于铺垫路道（如丹洲书院门前卧碑被久踏文字已严重漫漶），民居内也偶见，尤应收集保存。

东门（欢雷门）残存门洞。取名“欢雷”，是缘于当时勘查选址时“怀远民夷聚观如堵，咸举手加额。适有雷鸣轰然，龚（一清）遂著欢雷碑以纪异。”

明、清时代所兴建的官署、官仓、学校（文庙）等建筑久毁。

入东门内左下旁门楣上题“水池”，落款“民国廿六年秋日”，访知此处自古即用于城池、民居防火。民国时期曾将一些建筑设施改建。东门右向一带原为清代的文庙及箭道之地，圆门题“三江县公共体育场”，知为民国时改建。

怀远县迁治后，丹洲以其地理位置特别是水路的便利，成为东南地区连接西北边界的重要通道。客商无远弗届，纷纷到此谋求发展。城外东北向的会馆建筑天后宫即商业文化发展的产物。天后宫（闽粤会馆）为薛姓闽籍商人出银千余两，并得众商捐资，按福建漳州天后宫妈祖庙的格局建造。修建的时间据砌于厢房壁的“福建会馆碑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及道光二年（1822年）题款，可知在嘉庆初年。天后宫座西朝东，西为正殿，东为前殿，南北厢房将前后连为一体。正殿屋面久已毁缺，后墙存局部（外壁一角存“聚远”题刻）。左右厢房及前殿门墙尚存。门额石刻匾“天后宫”下有“闽粤一家”题刻，左右石柱分刻楹联：“浩浩其天，盛德在水；明明我后，正位乎坤。”从建筑规模看，天后宫是清代怀远县城最为气派的建筑，其工艺更是令人叹绝。

东门外清代的广东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久已毁，仅存残址。

丹洲书院坐落在古城的南面，坐东朝西，占地 1340 平方米，是古城最大的一处建筑。北门内《书院碑记》落款为道光三年中秋，为新编《三江

侗族自治县志》采据为书院创建的时间。民国《三江县志》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丹洲书院改为县立两等小学堂。”民国期间更名三江第一小学，现为丹洲小学所在。建筑保存较为完整。前门高峻美观，颇有西式建筑的特色。院内存旧式讲堂屋楼一处，尚基本完整，然久失维护，局部毁缺。

图碑考述

明清丹洲古城的概貌，在遗存的《怀远县总图·怀远县城图》碑上留下了清晰的记载。图碑嵌于东城门拱洞外砖壁上，宽85厘米，高133厘米。碑面镌刻图两幅，上为“怀远县总图”，下为“怀远县城图”。旁另有《补修怀邑城厢道路碑》，形制大小、石材与图碑一致，由怀远知县撰文，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文中提到的“玉如田君”即图碑的绘刻者田珩，因此可断定图碑刻制时间。

《怀远县总图·怀远县城图》是清代道光年间怀远县域和城区的实际描绘。县域内绘刻山镇、水脉、道路，线条细柔，行走飘逸，颇近于传统山水画之法，并随图形标注山峦，河流名称。巡检司、主簿驻所，以及塘、峒、堡、村等地名均予标示。各自然及人文的地理单位分布密集，可见一县地理大势。下部居中的县治图（《怀远县城图》的缩样），图的周边绘刻江流围绕之形，可见县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图中标示城垣、城门，城内简注重要的机构如县署、文庙、参府等，图上方有田珩识文。

《怀远县城图》相当于现代地图的城区图。碑图上下左右分别刻标“北”“南”“东”“西”四面。尺幅之间，城墙、城门楼、月城、道路、官衙、学校、寺庙、营舍、民居，以致空旷处的树木及河边的木船均刻绘工细，

清晰了然，可称石刻地图中的精绝之作。图碑与明城的文字记录相核对，城池规制、城门数、月城及主要建筑体等均相吻合，反映出明代城池的概貌。明城另修建有外城垣，即在距内城若干丈环绕营舍，距营舍若干丈“缭以垣”（即外城），可以见证于万历《殿粤要纂》的《怀远县图》。

历经数百余年，怀远县城池规制没有大的改变，但城内外建筑物或兴或废发生了诸多变化。《怀远县总图·怀远县城图》可利用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诸如地方行政建制、区划的考察，确定自然山岭的位置和名称，自然溪河的流向变迁，考究城市坐落位置，以及地名、街坊的变化，城墙、道路、官衙、寺庙、学校、营舍等建筑位置和形态。正是因为图中承载着诸多极有价值的历史地理信息，这无论对于地方文物或地方文献，还是就地图碑的稀见来说，足称珍逾拱璧，当然是值得珍重传存并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回忆丹洲、古宜两地首例死刑案

杨及愚

1950年春，土匪暴乱，县委县政府撤退到丹洲。驻守干部只有50人，其余都撤退到柳州学习。当时匪势猖狂，经常有小股土匪到板江一带扰乱。丹洲乡张乡长就在六溪村剿匪中牺牲。后来，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开展了一系列剿匪行动，但进剿中经常扑空。有一次得到确切情报，匪首王文伯盘踞在六溪，县大队赶到六溪时，发现土匪刚刚离开——肯定有人通风报信。经县公安局侦察，发现丹洲邮电所话务员覃显道曾于进剿当晚乘小船偷偷过江。为侦破内奸，县大队与公安局故意在通话中泄漏进剿消息，

深夜在板江河岸果然抓获了覃显道，当场搜出了通风报信证据，挖出土匪在板江街设立的联络点，覃显道如实供认了罪行。经上级批准，大会公审后在丹洲首开杀戒，于西门对河枪毙了内奸覃显道，镇压了匪势，安定了人心。

1951年5月重剿胜利后，县直机关迁回了古宜镇。在古宜首开杀戒的不是匪首，而是县大队的一名事务长。罪行是强奸匪属。重剿刚刚结束，抓获的一帮匪首家属关押在桐漏坪（后来的粮食局附近）一栋小木楼上。县大队事务长深夜闯入楼中，将龙胜匪首鲍军的妻子强奸。当时事务长的胸章被鲍妻扯下，事后狂奔到剿匪指挥部控告。事务长被捕后亦如实供认。本来犯强奸是罪不当诛的，但当时重剿刚刚结束，残匪尚未肃清，人心尚在浮动，为了稳定大局而使用重典，公开判了事务长死刑。我们在刑场看到旁边摆了一副杉木大棺，法警不打头部，但却一枪毙了事务长的命，行刑后即入棺安葬了。

枝柳铁路三江县路段走向和县火车站 定点商讨经过

曾飞

1971年冬，广西区指民兵专业八团，因形势变化，完成了“铁路先行官”（修公路）的任务后，所有人员回归各自单位。我又马不停蹄地去抓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支前工作。不久按上级通知，召开县领导会

议，区指、铁路来人参加，主要内容是商定三江县境内铁路的走向和县火车站的定点。会议在县委会议室召开，江宗廉副书记主持，我和黄启轩同志作记录，最后由我综合，形成文件上报。

由于战备需要，我常看军用地图，经常跑山头，所以对三江县境内的地形地貌比较了解。会议一开始，黄中道、江宗廉同志要我先发言，我认为：铁路从融安县的宝江进入三江县的丹洲后，应经板必——寨桐——江荷——牛浪坡——马坪——新林——周坪口——文大——马湾——程阳——林溪——美俗——水团——彭莫山，基本上沿长途电话线路走。县站建在周坪口，这样线路既直又节约投资，缩短列车运行时间，非常符合战备要求。大家认为是一个好方案，但是被工程师们及铁路方否定了，理由是：1、这条线路地质不好，特别是寨桐、江荷一带有半边山坍塌下来的可能；2、湖南地势高广西地势低，列车运行要绕山降坡。他们极力坚持现在的走向方案，说该走向地质好，靠河边符合战备要求。没办法，我们只好提出修改方案：路线从泗里过三角渡后，在大竹坡尾寨建车站，经大头坡入八斗。工程师们又说：三角渡是堆积层不能架桥。当时我想，他们早就定好了，开商讨会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

议题转入定县车站。铁路方提出只有程村、寨准两站选择并建议把县城搬到程村。大家认为不错：1、那里比较平坦开阔，县城发展 50 到 100 年无问题；2、一级电站回水到程村，水陆交通方便；3、地理位置处于全县中心点。那时县里没有什么大的建筑物，就是一个大礼堂和人委几栋三四层楼，但是搬迁县城要国务院批准。铁路方面认为，

只要大家多做工作，国务院会批准的。4、建议夏村铁路桥象融水那样建成公铁两用，在国务院未批准迁县之前，进出站也方便一些，铁路方面表示可以考虑。程村县站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们向上面汇报，也是根据上述意见写的，由黃日荣同志送区指挥部。后来传说某某领导不同意在吉宜大竹大队建火车站，可惜那片良田，影响农业学大寨。这种传说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在商讨会上我县提出的所有意见都被铁路方以“地质不好”为由给否定了。地质好不好，只有他们晓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祸从口出”的教训太深刻了，因此，大家不想争论太多，基本同意铁路方所定的方案。

第一批下放农村劳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

龙宪彰

这是 40 年前的事。当年分配到三江县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共是 25 名，我是其中一分子，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有北京的、武汉的、桂林的、南宁的等等。1968 年 8 月份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文化大革命局势逐渐趋于稳定，铁路公路交通开始恢复。

我们在 8 月下旬来到三江县委组织部报到，然后被分配到县内有关单位，如学校，医院、农林等单位。到单位报到后，一般没有什么事，每天学习，开批斗会，生活十分乏味。这样相对平静的日子很快过去。不久，根据上级的要求，大专院校毕业生必须下放农村或农场参加劳动。在这种情况下，1968 年 10 月上旬，三江县人事部门，把已经分配到各单位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又召集回

县城，住在当时的东方红旅社，集中学习一个星期时间，县领导到会作报告，鼓励大家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锻炼。大约国庆节后几天，在县大礼堂召开一个欢送知青下乡大会，会上每人发一套“毛泽东选集”，各人都打好行李背包，大会一散，贫下中农的代表就迎接到来劳动所在的生产队“住户”去住，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这批大学生分成两个组，送到离县城较近的两个生产大队劳动，一个是大竹大队，去了 13 个人，组长龙宪彰，副组长韦素英。文大队，去了 11 个人，组长杨昌源，副组长董明扬。

到生产队落户后，我们要过好四关。第一是饮食关。要过好这一关，必须要有坚强的毅力，只有把住户当成自己的家，家中的成员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吃的饭菜自己才能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在住户长期呆下去。六十年代，粮油是有指标的，每人每月定量供应。我们每月的 36 斤粮食指标如数交给住户，伙食费每月交 16 元，这样一日三餐由住户提供。第二是关系关。搞好和住户的关系，这是考验我们的重要一关。为了得到住户的欢迎，人人每天都认真地帮助住户做家务，挑水、打柴、打扫卫生或者烧水、做饭，样样都做。第三是住宿关。在大学读书，住的是高楼大厦，入夜灯火通明，学习娱乐活动都有一定的场所。如今住的是木楼，四处通风，入夜四周漆黑一团，照明全靠煤油灯。当时农村的文化生活很少，即使有也是简简单单，很粗糙，如当时生产队文化室，唱红歌，跳三忠舞等。开始时，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实在是枯燥，度日如年，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和农民一起生活，住宿慢慢习惯了。第四是劳动关。生产劳动是个大难关，当时劳动内容有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打谷、铲茶山等，这些劳动对学生来说，以前绝大多数人没有做过，有的虽然家住农村，见过大人的劳动，但是没有亲自做过，因此劳动能力差，劳动生产困难重重。如铲茶山这项劳动就碰到困难，茶树是种在山坡上的，山坡很陡，有的坡度在 60° 以上。这批人当中，近视眼的不少，参加劳动都配戴眼镜，上山还勉

强可以攀登上去，但是下山就困难了，这时只好倒退下山，退一步，移动一下，手脚并用才能下山。劳动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学习，我们很快掌握了当地的生产劳动技能，学会了犁田、耙田、插秧、打谷子等基本劳动技能。

在一年半的劳动锻炼过程中，绝大多数表现很好，受到农民的欢迎。1970年开春后，我们陆续调回工作单位。此后，不少人还成为经济建设中的骨干力量，如杨昌源后来曾任三江县县长，覃增任曾任三江县副县长，他们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古宜会馆的起源、发展和消亡

欧邦玉

会馆，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说：“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这就是说会馆的功能，除了集会、祭祀、酬神、联络感情、开展业务活动之外，还为来往同乡、同业人员提供联系业务和居住的方便。

古宜镇会馆始建于何年、何月，无法考证，现只是根据罗世俊、颜绍裘等老人从上辈人传下的讲法中说，估计始建于清道光（1821—1851年）、咸丰（1851—1862年）年间。

最早来古宜建馆的是广东商人，馆址建于今古宜镇小学，庙堂式砖木结构瓦房，面积约70多平方米，俗称粤东会馆。

第二是湖南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竹、木、铁器、车缝为主），他们以县

或以省同建会馆。较大的一座建于体育场（今街心公园）东头和兴沙街（今中长街头）之间（请参阅城区示意图）。三间杉木结构的瓦房，面积约为 150 平方米，俗称湖南会馆。

江西会馆始建于咸丰年间，馆址建于今县中医院至东冲路口一带大街（请参阅城区示意图），外围青砖高墙，门口两侧有一对小狮子头。进大门后，是一座木楼，楼上是戏台兼客房。中间是天井，后面是四间（中间没有隔墙）杉木结构的殿堂，供集会、祭祀、酬神、联络感情、开展业务活动之用。此馆是古宜镇唯一建有戏台、规模较大的会馆，面积约 600 多平方米，俗称江西会馆。

会馆的建立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一般都实行馆长制，但也有实行理事会制。由本籍同乡或同业推选德高望重、办事公道并有能力进行实际管理的人担任馆长或主任等职，负责制订章程并监督实行，负责召集会议，决定重大馆务，对外代表会馆进行馆务活动等。

馆长、主任一般任期一年，也有两至三年的，可连选连任。

会馆章程。一般由总则、组织、职员、会议、经费、附则等部分组成，管委会一般由 5—7 人组成。

清道光、咸丰年间，古宜仅是怀远县（县治在今丹洲村）的一个分署，可是为什么三省商人能云集古宜而不是别地兴建如此规模的会馆？据有关人士分析，主要是古宜社会较安定，地势好。其次是附近一带地区竹、木、茶油、桐油、药材、山货等土特产丰富，而且价格便宜。其三是地理及水运优势。古宜地处广西西北部，与湖南、贵州交界，源自资源、龙胜两县的浔江河由北向南奔腾不息地流经古宜，水路可直达柳州、广州和港澳。

在古宜下游的老堡，逆溶江而上，还可达贵州从江、榕江、三都等县。货物运到柳州，可转运湖南、江西，甚至可运达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了以上这些优势条件，广东、湖南、江西的商人在古宜建会馆就不难理解了。

随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致使社会民不聊生，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各项生意逐步萧条下来，从而也就促使各省富商逐步退回本地或另地谋生、发展，留下的一些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就无力继续巩固和发展会馆的正常运转。解放后，又由于公路、水路运输业的逐年发达，缩短了货物交易周期，加之旅馆、饭馆等第三产业的繁荣等等，会馆作为同乡、同道的一种机构，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逐渐失去，因此，会馆的消亡是必然的。

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 21 年（1932 年）5 月，三江县政府迁来古宜镇之后，初借粤东会馆为办公场所数月，湖南会馆被县参议会借用，江西会馆被常备队借用为军营。

三江解放后，粤东会馆被扩建为古宜镇中心校，即现今的古宜镇小学。湖南会馆，初期为电厂使用，1962 年被兴沙街一场火灾烧毁，后县糖酒业公司占地扩建为仓库。60 年代初期，江西会馆被拆除扩建为街道，便于车辆通行。以上就是三大会馆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大体经过。



侗族歌师亚华的故事

谭华铭

亚华①原名杨植敏，是三江县良口乡和里村人，生于清嘉庆年间。

约于 1860 年，亚华赴柳州府考举人，到柳州后进街去买笔墨纸砚，到商店后老板问“先生是来考举的？”其答是的。老板说既然如此，那我出一副上联给你对，对得上你尽管拿笔墨纸张去，没对得就照收你的钱。杨植敏说：“好啊，请老板出题吧！”老板问：“先生贵处？”杨植敏答：“怀远县人也。”老板挥笔“怀人千里远”，杨植敏接过上联，问：“老板原籍何处也？”答：“思恩县。”杨植敏沉思片刻挥笔写出“思友百年恩”，老板高兴得直叫好！这样一幅“怀人千里远，思友百年恩”的对联出来了，老板说：“笔墨纸张尽管拿去，讲过不用开钱。”

传说杨植敏后因其妻是杨门杨氏而落榜，回家后到相岭山隐居开山种地，边种地边编侗歌教育人们。如“劝世歌”教育人们处世要和谐；“父母歌”教育人们要孝敬父母。这些歌流传到同乐、洋溪一带侗族地区直至现在。1981 年我在寨大听良培村林甫②茂盛唱“父母美”侗歌时，我问其何来这么动人的歌谣？他直唱侗歌道：“你问我歌从何处来，请到和里南寨去问歌师名亚华！”

注①、②：按侗族民族习惯，尊称父亲为“亚”或“甫”。男子成家有儿女后，一般不再称呼其名，而是在其姓氏后儿女名字前加上一个“亚”或“甫”字。杨植敏的儿子名叫“华”，世人尊称杨植敏为“亚华”。林甫茂盛即林茂盛的爸。

回忆发展杂交水稻

覃安民

杂交水稻（俗称：杂优）是高产品种，亩产达 1000 斤（本地水稻仅 600 斤左右），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大途径。我县从 80 年代初开始推广种植杂交水稻，面积 30000 多亩。后来，由于观念、技术、资金等原因，推广步子缓慢。

湖南通道县独坡乡与我县独峒乡干冲村是接边地区，他们种植杂交水稻、红花草绿肥取得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对于干冲村的群众影响很大。因此，干冲村群众学习湖南经验，大种杂交水稻和红花草绿肥并获得成功，亩产高达 1200 多斤，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对全县震动很大。于是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覃安民同志召集农委主任张玉清、农业局长唐光儒、副局长覃增任（后任副县长）和农艺师石朝和等同志开会，研究干冲村经验。大家认为干冲村没种杂优前每年缺口粮 40 多万斤，要国家统销，现在种植杂优和红花草绿肥后实现了粮食高产，亩产达 1200 多斤，解决了温饱，还有余粮借给外村亲朋好友。由于粮食增加了，吃饭问题解决了，同时带来了畜、牧、鱼、林的发展，还办社队林场 2000 亩。最后，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把干冲村的经验向全县推广。

随后，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覃安民，人大副主任荣光明，农委农业局领导张玉清、兰德茂、唐光儒、覃增任和地区农业局局长张学声等同志，组织全县乡、村、生产队干部分三次到干冲村召开现场会学习经验。地区农业局组织柳北三县的融水、融安、三江中糙地区乡领导和农业干部

到干冲村参观学习。与会同志听取党支部吴光月同志介绍经验，一致认为干冲村的经验很好。通过参观，使与会者打开了眼界，也鼓舞了人心，大家决心把干冲村的经验学到手，让杂交水稻种植在各乡村开花结果。

为了解决好杂交水稻种子供应问题，县委书记罗黎明同志亲自带领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家班子领导到湖南的黔阳、绥宁等县联系并得到支持。覃安民、张玉清、唐光儒、兰德茂、梁然、覃增任和种子公司领导还分别到湖南的通道、靖州、绥宁、会同、黔阳等县联系解决好三江杂交水稻种子供应问题。此外，充分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由农业局局长唐光儒和站长马定宇带领农业技术员到丹洲镇三迁塅搞种子试验基地，力争杂交水稻种子自给。

解决资金。这是发展杂交水稻的又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钱何谈发展，三江是个穷县，怎么办呢？县委、县政府通过研究，决定从三个方面来解决：一是从扶贫资金拿出 50 万元；二是从县财政拿 30 万元；三是由县农业局上报地区农业局和自治区农业局，请求支持一部分。对于困难户，一时拿不出资金买种子的，县政府则给予免费供应种子加以解决。

加强技术指导。县、乡、村层层举办种植杂交水稻技术学习班，传授技术，使广大群众基本懂得和掌握杂交水稻的种植和管理技术。县、乡农业站还把种植杂交水稻方法、管理经验以黑板报和印成传单的方式发到各村生产队宣传辅导。农业部门的技术干部还深入村屯、田间宣传指导。

县农委副主任兰德茂和老堡乡长龚胜灵同志深入到西边山的红瑶、苗族地区，动员少数民族群众种植杂交水稻并获得成功，亩产达 1000 多斤，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有两户群众思想守旧，又没有钱买种子，政府则每户

支援 3 斤种子，但他们不但不种，还拿种子舂成白米，煮饭吃，事后还说汉人的米真好，又香又软真好吃。秋后，大家丰收了，他们才后悔当初不听干部的指导种植杂交水稻。第二年，这两户人家第一个到农业站去买杂交水稻种子。

由于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使全县推广杂交水稻种植获得成功。据统计，1987 年全县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70000 亩，比 1985 年增加一倍多，粮食总产量达到 1.28 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文革”期间三江中学“两进两出”牛浪坡的经过

张昌怀

自 1966 年 5 月以后，三江中学和全国所有学校一样，都“停课闹革命”。到了 1968 年 9 月三江县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通知各级学校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并派了军宣队。军宣队进驻了三江中学、良口中学、八江中学，组织领导学校开展“斗、批、改”，同时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三江中学由军代表李延年任革委会主任，刘逸作为教师代表任革委会副主任，他们都是由三江县革命委员会任命的。当时三江中学有教职工 44 人，其中被“审查”或“靠边站”的有 10 人。学生有 454 人，其中高中部学生 82 人，2 个年级 2 个班，即高六、高七班，他们来自全县各公社。初中部学生 372 人，3 个年级 7 个班即 41.2、42.3（原为 41、42、43，后合并改为 41.2 和 42.3 两个班）、44、45、46、47、48 班，他们来自古宜、斗江、

丹洲三个公社。当师生们回到学校后，哪有什么“复课”，实际是组织他们批斗被“审查”的教职工和所谓“站错队”的头头。大约历时半个多月，学校就传达广州军区某部某某中学在深山办学的经验。介绍学校如何开展“斗、批、改”。他们把学校办在深山中，实行“开门办学”，搞“半工半读”。这样，既能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又能使学生在劳动中得到锻炼，从而培养革命接班人。

1968 年 10 月，学校选址在古宜公社马坪大队牛浪坡上（即后来为马坪大队林场）。当时，那条山冲两边坡地都是荒山，满坡长满茅草、杂树，茅草高过人头。学校征得马坪大队和大里生产队同意，将那片荒山让给学校开荒种地办学校。

于是，学校先让几名教工组成先遣队到马坪村借用生产队的仓库和地坪打灶安锅，准备粮油蔬菜，等待学校全体师生的到来。同时学校要求全校师生各人自备劳动工具（锄头、柴刀各一把），自带行李。经过几天的筹备就绪之后，近 500 名师生背上行李，肩扛锄头，身系柴刀，浩浩荡荡地步行到离学校 20 多里外的马坪村。师生先是住农家，每天又步行 5~6 里路到牛浪坡上砍伐杂树，割茅草，自己动手搭建茅棚宿舍，并砍来细木条用野葛麻藤或竹篾捆扎成排当床板，铺上茅草就当床铺了。各班茅棚宿舍搭建完工后，全校师生又离开农家搬到荒山野岭上自己动手搭建的茅棚宿舍里住了下来。白天大家上山披荆斩棘，开垦荒山，晚上躺在高低不平的细木条上倾听虫鸣鸟叫。每天轮流派学生值日做食堂给养，值日学生每天或隔天步行往返四、五十里到古宜镇买菜，然后肩挑手提赶回牛浪坡，从而确保师生的一日三餐。这一时期，师生们实际上是一支垦荒队，以劳代学，

以荒岭作课堂，何谈读书上课。到了 12 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为了紧跟形势，学校领导请示三江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小组，同意将入学已满三年以上的 63 届、64 届、65 届三届高中初中学生一律认可毕业，可以离开学校。农业人口的学生一律回生产队参加劳动，非农业人口的学生回家等待，准备安排下乡插队。1969 年元旦那天，全校师生收拾行李，离开了牛浪坡，结束了深山垦荒的“校园”生活。

在那种非常的年代，不管人力、物力，不管有条件无条件，只要想办的事，一定要办。1969 年元月，三江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每个公社都要办一所初中。不管有无校舍和设备，也不管师资的严重缺乏，为了将架子搭起来，从小学教师中抽调一部分人来筹建初中，另从原来三所中学（三江中学、良口中学、八江中学）中调出一部分教师到各公社初中任教。当时三江中学教职工只留下 20 人，其中还有 10 人未“解放”，又从外校调进 4 人，共计 24 人。县革委决定，原三江中学留下的人员于 2 月份到牛浪坡林场（原三江初级林校）去开办三江高中。面向全县招收 4 个高中班，人数为 160 人，学生从 63、64、65 三届初中毕业生中选拔，由各公社直接保送入学。开学时间订于 1969 年 2 月下旬。可能学校离县城远交通不便，后来有部分学生不到学校注册入学，实际到校只有 149 人（其中男生 115 人，女生 34 人）。

当时三江初级林校留下的只有三间冲泥墙的教室，课桌凳也缺少，学校又向林场借用一栋两层木楼，楼上做宿舍，楼下当教室，才勉强解决师生的生活学习场所。师生的口粮当时是由古宜粮所供应，蔬菜要到古宜镇

来采购。由于学校距离古宜有 27 公里，又没有运输工具，为解决每天近 200 人的吃饭问题，学校只能留 1 位家住古宜镇的工作人员负责买米买菜，每天将采购得的物资送到车渡口等待县粮食局运粮空车返回柳州时无偿帮运送至牛浪坡。有时几天没有等到空粮车，蔬菜供应不上，师生们只能用盐水泡饭，这都是常有的事。我还记得有一次，食堂仓库没有米下锅，眼看师生们中午无法开饭，当天又下大雨，真是急坏后勤人员。幸好食堂还有几百斤粮票。我就向食堂会计领取粮票，借上粮款，带着 6 位学生戴上斗笠，披上塑胶薄膜，挑着锑桶，到十几里外的合桐粮所买回大米，才解决全校师生当天的午餐。

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师生每天生活都难以保障，上课又无教材，基本上以劳代学，师生们怨声载道。大家认为，原来三江中学有教室，有宿舍、有图书、有实验室等，设备齐全，空弃在那里不用，而来这个深山老林开办学校，怎么能够按照当时的“开门办学”要求——“学生以学为主，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不是成为一句空话吗？师生们纷纷要求把学校搬迁回三江中学（古宜镇大洲）。于是派代表到县革命委员会反映师生们的意见和要求，由于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在深山老林办学的方针不能动摇，一口回绝了师生的要求。直到 6 月初，三江县革命委员会任命唐志宗同志为三江县高中革委会主任，并同工作队（原文教科科长罗家阔和武装部干事朱学铸）来到学校。他们充分听取了广大师生所反映的意见和要求，于是由唐志宗同志亲自起草《关于把三江高中从牛浪坡搬迁到原三江中学校址的报告》，上报三江县革命委员会，据说当时极力主张在深山老林办学的领导人外出，由当时在家主持

工作的第二把手召开会议，研究同意三江高中搬迁回古宜大洲原三江中学校址。这时正值 7 月中旬，已临近放暑假，师生们听到学校得到同意搬迁的消息后，欢喜雀跃，高兴异常，终于实现了师生们回家的愿望。于是学校请来了两部大卡车，师生齐动手，把课桌凳和食堂炊具等等一并搬上卡车运回古宜，从而结束了三江中学在牛浪坡林场办学的历史。

知县马希武其人其事

马先广

明隆庆六年即 1572 年，怀远县（三江县原县名）县衙正在修缮中（今老堡乡所在地），由于某些官员在督促施工中对待民工苛刻，动辄克扣工钱，甚至关押捆打，一些民工被鞭打致死。官员的暴行引发民工怨恨，最终导致瑶民忍无可忍，2000 余人聚众暴动并拿起大刀攻城，把管工官员余冕、典史陆锦、郑鹏、徐士科、巡检郑元等六人杀死，知县马希武在此事件中也被砍致死，那天正是农历八月初三。

马希武，男，生辰籍贯无考。据《三江县志·宦绩》记载，当苗瑶蹂躏之后，马希武遍抚诸峒，民稍复业，乃议城旧县（老堡），瑶不利，遂啸聚围之。危急时刻，众人皆劝希武躲避逃走，他却临危不惧，坚持不走，说：“我为何走？最多死而已，我死了，能留给你们万年平安……”后在混乱砍杀中身亡。而早在 1547 年，县衙遭遇围攻时，知县布恒却弃城悄然出走。马希武被杀后，怀远近二十年少有县官踏足此地，或住宿办公皆在长安（融安），直至苏朝阳另择县治于丹洲。传

说，知县马希武大人被瑶民用大刀砍断了头，将无头尸体丢下河里，随河水流到老堡下游的一个小洲卡住。西坡村马氏兄弟知道后，有感于他的德政，又念其同宗同源，便连夜到那里把马希武的无头尸体抬到西坡“上达”山，用香木骨做了一个假头配好埋葬起来。从那时起西坡马氏兄弟为了纪念马希武，谁家都不准拿香木来做柴火烧，谁家烧了，谁家就会有人头痛。也就是由那年起，西坡马氏兄弟祖辈代代相传，在每年的清明节那天都要到马希武墓地扫墓祭奠。

再说知县马希武被杀后，尸体随水漂流到的那个小洲，从那时起周围村寨民众为了纪念，便把那个小洲取名叫做马洲，马洲这个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2010 年 6 月

布央—三江茶叶产业开发第一村

杨云善

布央村是八江乡的一个行政村，坐落在三江县的西北面，全村 548 户，总人口 2458 人，有茶园面积 3550 亩，每亩产茶 2500 斤，每亩收入达 3000—4000 元，年产值达 1100 万余元，农民年人均收入 5100 元，居全县前列。因此，由此产生了“茶叶楼”、“茶叶汽车”和摩托车、“茶叶电脑”等等。目前，全村有三成的农户把木楼改成了“洋楼”（混砖结构）。

说起茶叶，这个布央村的发家之宝，在其光彩背后，有着许多曲折和辛酸。1988 年秋冬，县扶贫办的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中，认为布央村的自

然条件，地理环境都很适合作为种植茶叶的示范村，但是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土地已经承包到户，如果连片开发，有的农户不愿种，或有的农户没有劳动力种，怎么办？等等。扶贫办的同志把这些问题向村委领导一一提了出来。村民委主任吴根雄同志很爽快地回答，这些问题都很好办，由我们村民委来解决。一天晚上，吴根雄主任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说县扶贫办把我们村定为茶叶产业开发示范村，首期要种植 300 亩，要连片开发，分户经营，集中管理，分户负责。吴主任认为，我们村前的这片土地有 300 多亩，最适宜开发，凡是在这片土地有责任地的农户都要种植茶叶，有不愿种的，我们村民委出面，进行土地调整，把土地调整给愿意种的农户进行开发，不愿种的农户，将在别处另调给土地。经过充分讨论，大家都同意进行茶叶产业开发。对在这片土地上有责任地而没有劳动力进行开发的农户，村民们表示愿意出劳动力帮助挖好土地。一场轰轰烈烈的挖山垦地种植茶叶的行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经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一片 300 多亩的茶园地就开挖出来了。

在县扶贫办和挂点帮扶单位县武装部的指导帮助下，茶叶种植下去了。不久，又请来了桂林茶叶研究所的专家定期到布央村进行茶叶种植指导，但是桂林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每次只来 2—3 天，现场指导该时段的茶叶管理技术，之后就回所里去了，有相当部分的茶叶种植户因事外出或有事不能听讲技术指导，或者当时听讲了，但没有完全掌握技术要领。于是村民委向县扶贫办反映这些实际问题，要求派人去桂林茶叶研究所跟班学习。县扶贫办立即派干部到桂林茶叶研究所反映情况和协商解决这个问题，桂林茶叶研究所对此事很重视，经双方共同协商，同意布央村派出 24 名中、青

年骨干到桂林茶叶研究所学习，掌握从种植、修剪、管理、采茶、制茶等一整套技术。两个多月后，派去的青年骨干结束了在桂林茶叶研究所的学习。在学习期间，这些中、青年骨干没有获取任何报酬，回来后又义务为村民服务，传授茶叶种植技术。我县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后，这些中、青年骨干又义务为新种植茶叶村民传授茶叶种植、管理、采摘、加工等技术。

布央村民兵队伍是一支过得硬的民兵队伍。为了帮助布央把茶叶种植搞成功，县武装部时任政委唐友相同志深入该村，把该村列为全县民兵“以劳养武”示范基地，成立青年民兵突击队，以锄为枪，大战荒坡。在开发茶叶基地时，谁家有困难，就帮谁家开垦土地；在护理茶叶时，谁家技术跟不上，就去帮谁家护理；哪家在种植茶叶上有困难，民兵就出现在哪一家。

两年后，300 亩茶叶园绿绿油油，第三年后就开始采茶，建茶叶加工厂。因此，布央村成了三江县茶叶产业开发第一村，也是全县茶叶产业的龙头村。

如今，在布央的带动下，三江县 15 个乡镇种有茶叶，全县有茶叶种植面积 12.48 万亩，其中可采面积 9.1 万亩。古宜镇、斗江镇、良口乡、林溪乡、八江乡、独峒乡、同乐乡种植面积较大。主要种植品种有福云六号、福鼎大毫、乌牛早、龙井长叶、浙农 113、铁观音等品种。全县目前有茶叶加工厂 407 家，其中注册的茶叶生产企业 16 家，茶叶品牌 5 个，有 4 个企业通过 QS 认证。从 2002 年至 2009 年 7 月，三江县生产的茶叶获“桂茶杯”特等奖 5 个，一等奖 8 个，二等奖 8 个，擂主奖 2 个；“中茶杯”特等奖 4 个，一等奖 3 个，优秀奖 1 个；“东郡杯”金奖 2 个；“柳茶杯”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3 个；“恒天杯”金奖 2 个，银奖 1 个。这

些获奖的产品是：天池绿剑、碧舫绿茶、白云银针、剑兰、黛兰、侗仙茗茶等。

三江第一份县报 ——《三江农民报》诞生记

黄启轩

1956年6月，县委决定办一份县报。5月初，我们一行5人受命赴当时的宜山农民报社作短期培训，回来后，即着手筹办。

报社地址定在县委原办公的旧木房前排二楼上（也就是后来的县招待所木楼，再后来拆除改建成如今的三江宾馆），只有一间办公室，一部手摇电话机，五张办公桌围在一起，十分简陋。人员开始是5人。即：陈世远（副总编辑）、罗家阔（从宜山农民报社调入）、唐文芳、郭启荣和我。我原在收音站工作，并入报社后，归入报社编制。不久，收音站人员换为盘宝荣同志，以后又换为覃岫云同志，我改为报社专职人员。我们4个人没有什么分工，在家都叫编辑，下乡通称记者。以后人员稍有调整变动：新增梅岭、覃光振、钟勇及勤杂小邱4人，调出陈世远（调往地委办），郭启荣回湖南原籍，改由罗家阔负责。

报纸开始定名为《三江农民报》，（1958年10月改名为《三江卫星报》）。经一段时间筹备后，于1956年8月1日出第一期报纸。开始时，报纸不是铅印的，而是石印的。所谓“石印”，就是用人工写在特制的宣纸上，然后贴在专制的石板上，再上油墨一张一张地印出来。用人工写可不简单，不

但要求字迹工整，大小一致，不得潦草，标点符号准确，而且要求不准出半点差错，不准涂改。当时县印刷厂有个李宝堂师傅，字写得非常好，又很耐心。一张四开四版的报面足足要写一整天，但他很少出差错，我们都很佩服他。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送报样到印刷厂，都要派人轮流去负责校对。校对虽并不是一件难事，但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好的事，要认真细致，不能有错字，不能错标点符号，这点我都能做到，可是要配一些画对我来说就难了。为什么要配画呢？因为石印写上去的字，整个版面不可能完完整整，总会剩头剩尾，留下空隙，为了使版面充实美观，必须配上若干小画来“填空”，以达点缀之效果。别人值班时轻松画画，而到我值班时却十分吃力，因为从读小学开始我的图画都是不及格的，现在要临时创作图画出来难度可想而知，但又不能不画。我只好把构思告诉李师傅，请他帮忙画，此事弄得我十分尴尬。1956 年时，报纸每 5 天出一期，从 1957 年起，改为每 3 天一期。内容除了转载新华社播发的国际国内重大新闻和外地报刊登载的特别新闻之外，主要是刊登县委、县府贯彻执行上级指示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及其取得的效果或成果，再就是日常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活动、商业贸易等（那时三江工业还是一张白纸），还有社情民意情况以及在各种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1958 年 4 月 10 日，报纸的印制由原来的石印改为铅印。

1959 年 6 月 9 日，根据上级关于撤销县报的指示（全国性的），《三江农民报》于是停刊了。停刊后，原来的通讯员一律转为三江广播站通讯员。《三江农民报》整整办了三年，总计出版 377 期，为三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学家马保之重游良口故地

廖韦春 文/图

2003 年 9 月 25 日上午约 11 时，天空晴朗，骄阳似火。著名农学家马保之先生一行 5 人在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莫虚光的陪同下来到三江，他指定要亲自去良口走一走，看一看。我随同时任三江县政协主席韦宗超、县委副书记秦宇陪同前往。

马保之，男，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马君武之子，1907 年 11 月生，广西桂林人，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民国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长、广西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首任校长、国家农林部农业司司长、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等，并曾供职于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据他的回忆，日本侵入广西后，桂林、柳州遭到轰炸。1944 年 9 月，他被迫疏散来到三江良口，继续从事他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当时，他主要推广小麦的种植技术，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他聘请了时年 20 岁的莫虚光作他的工作人员，并住在莫虚光伯父莫时忠的家。在良口近一年时间里，他不但在三王庙上课传授技术，还在田间地头实地指导农民种小麦。为了推广技术，他还从外地购进了一批小麦种子在良口推广。他对工作真可谓一丝不苟，给当时良口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县城到良口，当时需要 1 个小时的车程。车到良口对河后，坐渡船过河。这时，时任良口乡党委书记的吴群星带领干部群众 100 多人早已聚集在岸边迎候，待马保之一行人走上岸时，很多人鼓起掌来，有一支妇女队还穿着节日的盛装，站成一排拦在路中间——他们按民族习俗迎接贵宾

的最高礼仪唱起拦路歌，向尊贵的客人敬酒问候……时值 96 岁高龄瘦小身材的马保之老先生，时而微笑，时而挥手致意。马保之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走起路来，体力仍能胜任，只是不好走的路段才需人搀扶一下。他先是到他的老房东家去看，家里门开着，没有人在家（老房东早已仙逝），他走进昏暗的室内看了又看，后在门口长凳子上坐下，环顾四周，略有所思。坐了约 10 分钟后，他又起身步行，翻过寨背一个山坳，再平地走了二三百米后，前面是一片农田，他停下了脚步，拿起他的单管望远镜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反复观看。他说：以前他就是在这片田里搞小麦栽培试验，这里的山水地貌与 62 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一路上，马保之先生话语不多且音量偏低，但从他时而微笑时而凝重的表情看，他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既感动于当今故地干部群众对他的深情厚意，又感于当年工作的日日夜夜，新旧对比，自然感慨万千。观看了 10 多分钟后才往回走。中午在一座新建的侗家木楼吃午饭。饭后，马保之才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离开良口返回县城。他心里知道，此一别，恐怕再无机会到良口了。

马保之从良口返回三江县城后，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到程阳桥参观，回城午饭后返回桂林。

事后得知，马保之老先生离开良口后，2004 年 1 月 29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 97 岁。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为何不直上古宜

杨及愚

1949 年 11 月 18 日三江县解放。解放军继续追击白崇禧残部。当地自发组建的人民武装荣、莫、欧三部首领及民主人士共同组建了“治安委员会”，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驻扎在县城古宜镇。

1949 年 9 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即已批准于进军武汉途中组建了广西省、地、县三级人民政权。行进途中对外挂解放军番号（柳州专区为十三兵团教导队二大队，三江县为二大队三中队）。柳州专区和所属各县工作人员于 1949 年 10 月 18 日进驻湖南湘潭县。在湘潭和邵阳两地新吸收了 400 名干部，充实了地县两级机构。当时机构中主要由老解放区干部、部队转业干部、北京南下工作团员、湖南新招干部等四部分人员组成。在湘潭住了一个月，于 11 月 18 日到达衡阳（当天湖南与广西交界处黄沙河解放）。地县机构是随解放军中路部队挺进广西的，而三江县是解放军西路部队从湖南湘西进入解放的。县人民政府机构人员由湘南从黄沙河进入广西经桂林到柳州，于 12 月初才进入三江的。由于当时对“治安委员会”情况不明，所以进入三江后没有直上古宜，临时驻扎在旧县城所在地丹洲，于 12 月 18 日在丹洲挂牌宣布县人民政府成立。经县委书记柳林（对外称政委）、县长何俊上到古宜与“治安委员会”谈话后，才于 1950 年 2 月下旬（农历正月初）从丹洲搬上古宜。“治安委员会”工作人员由县人民政府接收重新分配工作。1950 年 5 月土匪暴乱，县直机关又从古宜撤下丹洲，驻守丹洲整整 1 年。1951 年 5 月剿匪结束后，才又二次搬上古宜。

九江水电站抢险

曾飞

在斗江人民公社境内的九江水电站，1972年春夏之交，电站出现险情，县委分工我去抢险。

受命后，与当时的县水电局局长曹积尧同志前往。听了汇报后得知坝址测量有误，基础上移，水坝未达到高度，不敢再筑了，排洪道泄洪成了问题，坝底压力管和机房难以施工。更为头痛的是水泥问题，三江县没有水泥厂，那个时代没有指标，有钱也买不到水泥，而建一个水电站的水泥一超再超，还需要多少水泥才能建好水电站没有底，施工队队伍全是该公社的民兵，在干部和技术人员指挥下干活，每天干什么？怎么干？有时带队的没有底，管理民兵的石成阶同志（原县人民武装部转业干部，水电局副局长）对我说：“我等于一个生产队长，有时天亮才叫我派工，随喊随到，随到随干，大家都烦了……”

掌握了基本情况，我和曹局长召开有唐超（站长）、林育英（工程师）、石成阶等建电站的领导和技术人员20多人参加的“诸葛亮”会议，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抢险意见，深入现场，对照设计图纸定下方案明确任务和责任，按图施工，并列出用料清单上报有关部门。那时生活很艰苦，住工棚，铺树枝，睡稻草，吃野菜送粗米饭，民兵们经常半饥半饱出工（县里工程没补助，由该公社各大队抽调民兵群众，记工分，自带衣物和粮食），累了困了，带队的领着大家，背诵几条艰苦奋斗的毛主席语录，振作精神，力量来了，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干完干好为止。就这样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经过五个多月的奋战，终于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我们庆祝胜利了！石成阶同志不知从那里弄来三、四斤红薯酒和半斤黄豆，煮三大盆野菜（没有油，大家的油指标都交给民兵连食堂了），砍竹子做酒杯，曹局长、唐超站长提议为完成抢险任务而干杯！大家欢呼雀跃举起竹筒，像模似样的碰竹杯，一饮而尽！

晚上，唐超同志要求我为电站写站名，我说我的文化不高，字又写得不好，不要出我的洋相了。但经不住被他左泡右磨，我借着酒劲，摊开纸张，连写三次，终于写成“九江水电站”五个大字。

打野猪趣事

曾飞

三江县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气候良好，土地肥沃，山林茂密，这给野猪的生存和繁殖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野猪经常危害庄稼和竹木，有时还出现伤人事件，七十年代前，政府对打野猪给予奖励，凡打死一头野猪不论大小均奖励五元人民币，广大民兵群众积极响应：“消灭野猪，保护生产。”但是，如何有效地打到野猪，既安全又不白跑，在实践中，我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供大家参考。

一、时间的选择

雨过天晴是打野猪的最好时机，因为下雨把野猪过去活动的脚印全冲刷了，最近最新的活动情况会一目了然地写在雨后干净的土地上。雨后上山发现野猪脚印，说明野猪不会很远，顺着脚印很快就会找到野猪。野猪喜欢群居，选脚印大的追踪，选大的打。

二、包围伏击

通常要 5~6 个有射击经验的民兵群众便可，每人带上 4~5 发子弹，一旦发现野猪脚印，由一位有经验的人“理脚”（顺着脚印跟踪追赶野猪），其余的人根据山形地貌，由组织指挥者，判断野猪可能出山的坳口，设伏者均应在山坳顶部下几米的侧边，利用树草掩护，待所有守坳者全部到位后，指挥者发出信号，通知理脚人开始追踪，并吹响哨筒（子弹壳或小竹筒）指示方向，追到哪里吹到哪里，若发现野猪可用平常讲话的音调，声音可大一些：“大家注意咯！发现野猪了，可能有 150 斤啊！已经向某某方向行走了！”野猪行走的特点，在不受惊吓的情况下，速度较慢，而且走几步停几步观察动静，认为无事又继续行走，此时理脚者，尽量靠近追它过坳，但不宜开枪射击（确实有把握也可以开枪射击）。野猪一般白天不找食物，躲在有茅草（有的做有猪窝）或在小树林中休息。往往野猪出山过坳时，埋伏在那里的射手，不易看到野猪，但在相反方向的设伏者很容易看到，必须禁止射击，只能指示野猪所过山坳的伏击者野猪所处的具体位置，待野猪接近 10 多米时，瞄准猪耳朵尾的前夹处射击，枪响猪倒地。

三、捕猎纪律及规矩

上山打野猪或其他猎物分肉有很多规矩，如丹洲、斗江等地，谁开枪打死野猪的，可分得猪头一个（按猪耳朵尖处，下刀割下猪头），猪脚四个，肉按猪的重量每 10 斤给 1 斤，剩下的和参加者平分又得一份。古宜一带只按全重量 10 斤奖 1 斤。独峒、八江、林溪、同乐等地与古宜差不多，但把猪下水及一些肉煮熟，肉汤煮粥，所有参加者饱食一餐，并饮酒猜拳庆贺胜利。而独峒归亚苗族等地，把猪肉全部煮熟吃一餐后，剩下的均分。此外，各地还有：“山上的肉见者有份”的规矩。即枪响时，无论何人跑过来，看见打死的猎物均可分得一份，但是猎物穿上抬杠就不能分了。还有“补

火”者，即第一射手没把野猪打死，第二者补火把野猪打死，所有奖励两人平分。

重奖之下，有人喜抢“头炮”乱开枪，这个非常危险，必须严格纪律。在出发前必须讲明打野猪的注意事项：严禁远距离射击、或抢先开枪的行为，野猪出哪个坳口，由那个守坳人射击，应沉着冷静近距离射击（10~20米），保证一枪击毙野猪。击发时站的位置、射向、弹丸穿透野猪后的弹落点必须安全可靠，千万注意理脚人的位置，做到万无一失，绝对安全！野猪这个东西，一但受伤，见人就攻击，非常危险，所以强调必须放近打（野猪不受伤不会攻击人，所以放心近打），一枪见效。

1963年夏，我在丹洲公社板必大队搞双抢工作（抢收抢种），一天上午有人报告民兵营长杨正仁说：“昨晚有野猪在程祥路口一山冲里毁坏了半亩稻谷。”我立即和民兵营长等五人，并带上一条猎犬，奔赴现场。狗一进山不久便叫咬，我随即跟进，发现狗正与猎物对峙，朝狗头狂叫方向看去，模模糊糊一个黑色大物体，像个小牛仔。当时，我不敢开枪怕误杀家畜，先用枪管小心地拨开阻挡视线的树枝杂草，啊！一只大野猪，猪头正朝着我，大概有50米远，我瞄准猪脑袋击发，“叭！”一枪，狗猛扑过去，但不叫了，说明野猪被我击毙了。民兵营长等人赶来，把野猪抬回去一称170多斤，取下两颗獠牙对在一起，正好一个圆圈。头、脚和肉，我分得40多斤。

有的地方，如丹洲、同乐等地有用狗赶野猪的。训练有素的猎狗，用一只就可以了，狗多了乱叫，有的野猪害怕跑得快不好射击，一条狗由主人带着指挥，狗发现野猪，不停地叫咬跟踪，被激怒的野猪有时也会调头与狗对峙，伺机攻击猎狗。此时，随狗的人，认为确实有把握开枪射击的，则果断举枪射击，狗扑上去不叫了，说明野猪被你击毙了（狗扑上去吃野

猪的血，所以不叫了，但发出“唔唔”的声音），你可放心前往捆猪穿抬杠了，以免有人跑来参加分份。如果打不中野猪，野猪听到枪声一般一口气逃跑两三个山头。小野猪则放弃捕猎，如果是大家伙（大野猪）有能力的打猎队伍也可跟踪猎杀。

此外，万一野猪被打伤，必然拼命攻击人和狗。在这种情况下，人可以爬上大而高的树躲避、射击或等待救援。

三江县火力发电厂始建回忆

赖守基

三江县火力发电厂，经过半年多的筹建，于 1956 年春建成投产，这是我县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火力发电厂，厂址在古宜镇中长街，即今县老烟草局仓库。从那时起，县城开始用上了电灯照明。

当年发电厂有管理干部覃汉风、赖守基，内燃机技工兰火、胡业芳、覃甫，外线电工张润伍，司炉工侯光荣、胡春林，全厂干部工人共计 8 人。发电设备只有 40 匹马力动力煤气机一台，15 千瓦直流发电机一台，附设高炉一座，高炉燃料使用栎木炭，高炉需配备专人施炉，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岗位，时而要上炉顶高处加木炭，疏通炉火，火力不旺又要到炉口鼓风，过旺了立即要泼水降温，以保证煤气机正常运转，只要慢操作一下，煤火立即减弱或中断，动力即减弱或熄灭。

由于发电量极小，供电极不正常，当时只供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单

位办公用电，尚有部分单位、街道居民和城郊村民还用不上。就是用上了电的单位，灯光像萤火虫一般，同时每晚还有一两次断电的现象发生，断电时间长达 5~10 分钟，用户还须备上煤油灯，作停电备用，这种照明用电持续了两年。1958 年，三江县在古宜大洲开始兴建水电站，安装木制水轮机 3 台，装机容量 160 千瓦。建成投产后，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街道居民、城郊部分村寨村民等，才解决了生活照明用电，火力发电从此自然消逝。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 50 年过去了，回首过去，看看现在，继县城古宜大洲水电站之后，1966 年开始，三江县水电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县管电站相继在斗江、高基、良口、丹洲等乡镇建立了团结、九江、产口、西坡等水电站，同时乡管电站也相继建立了同乐、纯德、晒江、高岜、梅林、归能、六溪等一批小型水电站，还有村管小型水电站 200 多个，鉴于水源、技术、管理诸多原因，这些小型水电站逐一报废部分，余下部分或并入大电网，或为大电网所取代。

可喜的是：1972 年及 1987 年、2002 年间，相继在三江县境内的麻石、厘金滩、草头坪兴建了较大型水电站，从而使该县水电建设事业跃上了新台阶，“萤火虫”的年代已成为史料载入史册。

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侗族民兵石文功

欧邦玉

1960 年 1 月 3 日早上 8 时左右，独峒公社岜团大队治保主任兼民兵营

长石文功一家正在吃早饭。这时，社员吴仕学进来，他以侗家人特有的礼貌同石文功和其爱人打招呼之后，说有事外出，需要主任帮忙开一张证明。石文功和其爱人请他吃早饭，他说已吃了。石文功请他坐下稍等，他答应，但不坐，东张西望。当他看见一杆七·九步枪、一杆鸟枪靠墙而放时，便走向前去拿枪，并说借去打猎。石文功见吴去拿枪，就迅速站起前去护枪，并说：“上级不准乱借枪。”一个要借，一个不给借，俩人就拼命地争夺起来。这时，社员吴万堂也冲进堂屋，见吴仕学正同石文功争夺枪支，就在墙这边拿起鸟枪并迅速打开板机，用枪口对准石文功击发，不响（忙乱中弄丢结子）。吴万堂见鸟枪不响，丢下鸟枪前去帮助吴仕学抢枪，并用双手卡石文功的喉部。石文功爱人见状不妙，也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帮助石文功。吴仕学在吴万堂的帮助下，打开枪栓并迅速推弹上膛击发，不响。紧接着，吴仕学又打开枪栓并又迅速推弹上膛击发，仍然不响（后经检查，撞针短一些，但石文功后来拿此枪上山去追捕吴万堂时，一打又响了，多险啊！）。正在这万分危急之时，石文功的母亲在门口叫来石文功的侄子石朝昌、民兵吴仁光、吴全玉三人。当石朝昌等人快步跑上楼时，被吴万堂听见了。他知道情况不妙，就急忙放开石文功往外跑。吴仕学也想逃跑，但被石文功夫妻二人死死抓住不放。最后在石朝昌等人的帮助下，将吴仕学捆绑押送公社交给公安干警。随后，石文功又引领公安干警和民兵上山追捕吴万堂，并将吴万堂抓捕归案。经过审讯，才知道吴仕学、吴万堂二人均参加以李仁辉（独峒归盆人，被捕后逃跑，被解放军打死在独峒食堂瓦面上）、吴开明（51年被镇压的匪首吴天德之子，吴开明本人也被解放军打死在贵州山上）等人为首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活动。

平息暴乱后，柳州军分区授予石文功同志特等功。同年被推选出席全国民兵工作会议。

4月23日，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会议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奖给石文功半自动步枪1支，子弹100发，布鞋1双，钢笔1支。

石文功同志出生于1929年，由于家庭贫苦，从8岁起，就帮家里砍柴、割草、做农活。12岁那年，父亲长年帮地主做工，因劳累过度得病无钱医治而早故。从那年起，石文功就帮地主做长工，一做就是九年，可说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驻村工作队的培养和帮助下，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的他积极带头参加清匪反霸（50年4月三江土匪暴乱，并占领县城古宜镇1年），成为土改、合作化的积极分子，从而被选任村治保主任、民兵营长等职。1959年入党，1960年至1962年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因文化水平有限，主动提出辞去党支部职务，让有文化的年轻党员担任，但他仍被选任治保主任、民兵营长，1981年年老离任。

石文功同志居功不自傲，更不要求当国家干部，安心于农村，积极带头劳动，维护社会治安。尤其值得敬佩的是，不管上山劳动、平时开会、晚上睡觉，都身不离枪，视枪如命。现在虽然年已八十，但仍上山劳动，自食其力。真可说是我党农村中的优秀党员，侗族人民的好功臣。

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侗乡女民兵营长侯芽妹

欧邦玉

侯芽妹，1937年7月17日出生在古宜镇大洲村滩根屯。解放前，由于家庭贫苦，无钱读书，七、八岁时，就开始帮父母做家务、干农活。解放

后，在工作队同志的帮助下，她逐步觉悟，积极参加儿童团、妇女、民兵工作。**1955** 年合作社时，成了生产队、大队的积极分子，并于 **1956** 年间加入了共青团。

结婚后，在家婆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她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和做社会工作。**1958** 年开始大跃进之后，她被选任大队青年民兵突击队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任民兵营副营长。

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她正值豆蔻年华，精力充沛，革命干劲十足。不管做什么工作，她都以身作则，处处带头苦干。她带领青年民兵突击队，日夜战斗在开田开地、开荒造林的山上，抢插、抢种在田间地头。夜深人静之时，她还常和民兵一道巡逻放哨，维护社会治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武装部干部的直接帮助下，她利用农闲和平时休息时间，组织民兵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对民兵工作的有关指示，带头勤学苦练各种军事动作，较好地完成各项军训任务，使西游民兵特别是青年民兵突击队，成了全县有名的青年民兵突击队。她本人也在 **1958** 年、**1959** 年县武装部组织的实弹射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成了全县有名的女射击手。

1960 年初在全县民兵工作会议上，她同特等功荣立者石文功一道被推选出出席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在去京途经南宁时，军区欧司令知道她是三江有名的优秀射手，特邀她进行射击比赛，最后，俩人成绩不分伯仲，受到欧司令当场表扬。

在京共 **21** 天，除了开会、学习、讨论之外，还参观了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先进单位，游览了故宫博物馆、长城等名胜古迹。尤其值得庆幸的是 **4** 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这

是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幸福时刻！

会议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授予侯芽妹半自动步枪 1 支，子弹 100 发，布鞋 1 双、钢笔 1 支。

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她就被选任大队妇女主任。1966 年，县委决定升任她为丹洲公社妇联主任。怕她难离故土，要求“四清”工作队领导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尽快去上任。但她为了认准的革命事业，决定留在农村，把机会让给更适合的同志。这充分反映了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精神。从此，她在农村务农一直到年老。

1981 年年老离任后，她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带领儿媳除了种好责任田、搞好种养等家庭副业外，还开荒造林，种下杉木 20 多亩，板栗 10 多亩，近年杉木成林，板栗结果。更值得敬佩的是，她虽然年老离任，但她对村里的大事经常关心过问，协助村干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深受干部、群众的好评。

三江县首批的士潇洒亮相

吴永华 石 澜

鲜红的车子穿行于大街小巷，文明周到的服务让人舒服。连日来，在三江县城又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从 2008 年 10 月份开始，三江首批 15 辆“的士”（桑塔纳型轿车）正式运营，掀开了我县交通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

2008 年 7 月，三江县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由广西瑞通运输集团公司投资 500 万元成立了三江出租车分公司。10 月 1 日，第一批 15 部出租车在县城大街小巷亮相。它们舒适安全，价格低廉，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也为“的哥”“的姐”带来收入。“的士”起步价 3 元（2 公里内），之后每 200 米 0.3 元。驾驶员承包按每月 1800 元上缴公司，承包期一年。“的哥”梁林向笔者介绍：“开的士辛苦是辛苦，但一天跑车下来能赚 50 至 100 元不等，收入也还可以。”

据三江出租车分公司负责人孙三好先生介绍，第二批 5 辆出租车已在 2009 年 1 月 1 日即春节前投入运营，给市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和出行便利。此外，还引进 6 辆低能耗、低排量的公交车，有效缓解交通压力（全县公交车共 10 辆）。

三江县解放初期交通运输概况

赖守基

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桂北山区，境内山峦重叠，河流纵横。解放前，全县还没有修筑公路，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被高山阻隔，绝壁拦路，进出货物全靠水路木船运输和人扛肩挑，交通十分落后，笔者 50 年代曾在交通运输部门工作，搜集有部分史料，现作整理概述如下。

一、水路运输

县内航道以老堡为分支口（故名老堡口），主要航道有：浔江航道（由

老堡至沙宜)、溶江航道(由老堡至石碑),融江航道(由老堡至丹洲)。小河航道原有7条,1952年12月,实行区域自治县后,田寨河、平卯河划归融水县属,本县境内现有:林江(由石眼至林溪)、武洛江(由黄排至马胖)、苗江(由产口至同乐),合水河(由滩头至合桐)、斗江河(由斗江至桐叶)。行驶浔、溶、融江的自划木船,载重为5至20吨,行驶小河的自划木船,载重为0.5至2.5吨。

1958年前,县内水上运输均为自划木船,当年全县有古宜、富禄、老堡三个木帆船运输社,专业木船159艘、801.7吨,农副业木船有290艘、609吨。1959年,三江县交通局从梧州造船厂购入机帆船一艘48匹马力,载重28吨,为三江第一艘机帆船,命名为“红旗号”。由于当时三江还没有驾驶人才,从柳州航运局分配来驾驶员唐国良、梁建安,县内安排机房动力技工兰火、何振基,水手龙凤来、黄自成、梁国才、龙长顺。9月29日,三江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古宜榕树底码头举行首航剪彩仪式。至此,三江开启了机动运输的历史。受此鼓舞并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由运输公司副总经理叶彩金,带头推行木帆船一列式拖带法,全公司每月节省1334个劳动工日,提高了经济效益,收到很好的效果,后来在主要航道广为推行。

1964年,三江县交通局又到梧州造船厂购入机帆船5艘,每艘为26匹马力,共载重82吨,船号原依顺序命名为“三江1号”、“三江2号”、“三江3号”……1965年初,更名为“团结号”、“跃进号”、“战斗号”、“前进号”、“胜利号”。随着机械化运输不断向前发展,至70年代后,专业木船基本上改装动力,以机械代替人力劳动,逐渐实现机帆船运输。小河运

输由于水源枯竭，加上众多的小型水电站的拦河筑坝把航道截断，同时沿河乡村已通公路，公路运输方便，小河农副业木船运输自然淘汰。截至 1985 年，全县专业木船 229 艘，其中机帆船 219 艘，古老的运输方式就此结束。

二、公路运输

千百年来，三江人民受尽了交通不便之苦，境内仅有古道，便于行旅、挑运流通，尚未修筑公路。解放前，县境内古道路面较大、行旅较多者有：古丹乡道（古宜至丹洲），富丹乡道（富禄至丹洲）、富碑乡道（富禄至石碑）、富古乡道（富禄至古宜）、良堡乡道（良口至老堡）、同洋乡道（同乐到洋溪）、古马乡道（古宜至马胖）、寨平乡道（寨淮至平流）、江巴乡道（八江至巴团）等等。

自治县成立后，上级政府十分关心三江的交通事业，派出技术人员前来勘测、设计、下拔资金，帮助民族山区疏通河道，兴修公路，发展交通事业。1956 年 5 月，开始修建第一条由县城古宜至沙宜公路，全程 30 公里，接通湘桂公路，可通达桂林和湖南通道，1957 年 5 月修通。5 月 8 日，在河东三元寨边（临时车站售票处），举行通车典礼，三江至桂林首趟班车从古宜开出，结束了三江不通汽车的历史，在三江交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58 年秋，开始修建古宜至长安公路，全程 80 公里，简称长古公路。记得当时工程指挥部设在牛浪坡，指挥长王忠富（县委工交部长兼），副指挥长赖智基（工交科副科长兼），常驻指挥部工作人员吴政元（由富禄区抽调），张玉棠（由丹洲区抽调）、赖守基（由县运输公司抽调，负责抄写、刻钢板、油印等工作）。1959 年 12 月，长古公路全线竣工，12 月 28 日，三江至柳州通车，从此，进一步打开了三江连接外界的通道。长古公

路竣工后，成立三江公路养护段，张玉棠任党支部书记，吴政元任段长，侯世荣任会计。下设 7 个养路道班，一个渡班（即古宜车渡），有职工一百余人。据《三江县志》记载：古宜至沙宜，古宜至长安两路段，全长 110 公里（古沙线 30 公里，长古线 80 公里），工程总投资 561 万余元，投工 272000 工日，全线公路桥 30 座，涵洞 311 个。接着从 1965 年至 1985 年，先后建成了古宜至林溪（31 公里）、黄排大桥头至八江（15 公里）共 15 条公路，共长 301 公里，初步形成了三江公路交通网。为加快商品的流通，1972 年 7 月，成立了三江汽车队，开始有解放牌汽车 6 辆，县内第一代汽车司机有：赵金玉、关树才、杨老成、蒋发成、罗凤翔、莫自才等，1978 年后，县粮食局、商业局、林业局先后成立车、船队，解决部门商品运输。由于公路、水路的通畅，结束了三江有史以来交通闭塞的历史，促进了我县农、工、商、贸的发展。

图一：1960 年春，三江县购入第一辆解放牌货运汽车。图为好奇的人们攀爬新车上留影。

图二：1959 年 9 月 29 日，作为向国庆 10 周年献礼的“红旗号”机帆船正在试航。

图三：1959年9月29日，三江县人民政府在古宜榕树底码头举行第一艘机帆船“红旗号”启航典礼大会。图为县长吴仕德在现场剪彩。







贲公佬的故事

肖启忠

贲运发（民间尊称为贲公佬，1920年10月——1998年8月），家住三江侗族自治县丹洲镇板江村七星屯，75岁了，仍然耳聪目明，精神饱满。他爱说爱笑，歌又来得快，不管老奶、少妇、年轻汉子，个个爱和他亲近。他走到哪里，那里就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

他做过30年民办兽医，70年代，在丹洲兽医站工作。一次，曹站长下乡到合桐村，那里有位姑娘荣秀英，爱唱山歌，又爱开玩笑。她唱首歌给曹站长：“妹莫愁，嫁个老公会阉牛；一天阉得三五个，切来有个大钵头。”年轻的曹站长不会答，羞得一脸发烧。

后来贲公佬和曹站长一同下乡到合桐，正在做手术时，荣秀英又唱起这首歌，故意逗弄。贲公佬头未抬，手不停，随口答道：“毛主席思想记心头，我为革命来阉牛；保证阉肥莫给瘦，抢上季节夺丰收。”荣秀英仔细一看是他，自知不是他的对手，说声：“是你呀！”赶快走了。

有一次在丹洲圩场赶街，遇逢亲戚，他想买点鱼到饭店炒菜待客，就问鱼价钱，卖鱼姑娘答8角1斤。贲公佬笑嘻嘻唱道：“阿妹做事大不合，人家6角你8角；若是你还不减价，恐怕到夜卖不脱。”姑娘把“减价”听成“改嫁”，羞红了脸，低声说：“你莫讲，我是卖8角的，现在6角给你。”贲公佬又唱道：“阿妹做事不公平，6角你也卖一斤；一个萝卜两个价，鸭蛋双黄有二心。”唱罢笑着说：“阿妹你莫放在心

上，阿公是好玩好耍的。”

贲公佬爱管“闲事”，他用歌来管。一次下乡到板六村，听说梁家媳妇待老人不好，他上门唱歌：“出门我见某些人，媳妇做事有偏心；她的爷娘她看重，丈夫爷娘她看轻。见她爹娘眯眯笑，丈夫爹娘鼓眼睛；你家也有哥和嫂，把你爹娘也看轻。你的爹娘说你听，看你痛心不痛心；将心比心自己比，比完自己比别人。几句粗言说不尽，自家慢想慢详情。”后来，他下乡又进梁家，家婆千恩万谢，说：“你的山歌好动心，媳妇比以前好万倍了。”

几年前，丹洲村有个青年，蛮不讲理，又打老子又打娘。那天贲公佬见他正打老子，就用山歌劝道：“出门我见好多人，有人养崽无良心。有些人家打老母，有些人家打父亲。若是养出那些崽，天雷击顶炮穿心。哪天你也会养崽，他也照着这样行。哪天孩儿也打你，看你痛心不痛心。自古好丑总有报，天眼恢恢看得明。忤逆还生忤逆子，孝顺人生孝顺人。”那青年对他不敢怎样，但又不服气，说：“你敢管我？”后来他打爹骂妈，哥讲几句，他拿刀追哥，哥讲：“如果再这样，我一枪打你。”他不听，又一次拿刀要砍哥，哥转身给他一鸟枪。他身上中了不少铁砂，抬到医院抢救。人们说：“贲公佬不是唱对了吗，‘天雷击顶炮穿心’真是对得好好的。”那青年出院后，也晓得过去错了，向贲公佬道歉：“我做得过头了，没听你的话，对不起你老人家。”

对山歌的故事

肖启忠

我最爱家乡的山歌，特别爱听家乡的歌手对山歌。

真巧！我碰上对山歌啰！1995年的一天，柳城县凤山70多岁高龄的黄老奶，在歌台上与三江县丹洲镇75岁的贲运发（人们习惯尊称：贲公佬）对山歌。对歌前，好心人对贲公佬悄悄讲：黄老奶是有名的歌手，要注意点破。贲公佬笑笑：“我向她学习嘛。”

只听黄老奶先起歌：“不讲不笑心不开，不讲风流人老来；不讲风流人老了，挑水淋花花不开。”

贲公佬笑了笑，故意“刺”她：“为人年老不知羞，开口还要唱风流；牛在栏里牛也累，四脚也为两脚忧。”

围观者哄地一阵笑。旁边一位象州县老歌手“打抱不平”：“人畜不分好荒唐，唱歌懵懂老三江；看你牙缺声伶俐，出口无章却外行。”

贲公佬不急不忙，回了一首：“莫要急来莫要忙，我唱对她你来帮；你是青山老竹鼠，不咬竹蔸咬芭芒。”

人们又捧腹大笑。象州歌手停了嘴，黄老奶缓缓气，唱道：“难了难，重重挨困在高山；快枪驳壳未曾有，单筒难顶水机关。”

贲公佬见对方以退为进，就顺水推舟：“莫讲难，何曾围你在高山；陆地机枪无用处，你坐飞机放炸弹。”黄老奶接着唱：“难了难，好比鲤鱼上九滩；上滩不怕龙门跳，只怕鱼叉把背翻。”听唱到鲤鱼，贲公佬的歌接嘴而出：“红嘴鲤鱼白嘴腮，摇头摆尾来上滩；柳州铁桥你碰断，我的捞绞快拿开。”

黄老奶暗暗扯蓬转舵：“怕哪点？正大光明怕哪人；手上拿只崖鹰鸟，哪怕麻雀叮眼睛。”贲公佬被逗起了斗兴，唱：“新打鸟枪七斤半，连砂带码有八斤；麻雀嫩鸟我不打，单单要打老崖鹰。”黄老奶又唱：“大船来到小河中，小船莫乱扯风篷；黄猄麂子莫乱叫，几多猛虎在山中。”贲公佬生在高山，长在老林，偏不信这一套：“今早吃饭筷子跌，上好硝药安好结；人讲凤山有猛虎，特意游山来打猎。”黄老奶想“教训”他一下，唱：“不屑不屑真不屑，豆腐摇摇不上刀；猛虎坐在石板上，谁人敢动半根毛。”歌还未收音贲公佬就唱开了：“蛇在岩洞我敢弄，虎在深山我也撩；不怕猛虎拦路坐，扯起烟筒当狗敲！”

“哗——”台下的笑声、掌声、欢呼声像暴风骤雨，经久不息。人们好兴奋，一首首歌对下去，吃饭时间早过去了，人们却把歌手们拦住，不让散场……

山 歌 摘 选

贲运发

一

孝敬父母好易为，
不用抱来不用背；
夏天不给日头晒，
冬天莫给寒风吹。

二

这个司机好良心，
哪里招手哪里停；
毛主席语录学得好；
全心全意为人民。

这个司机好良心，
穷人招手你也停；
祝你常年行好运，
一路平安到北京。

三

问

八月十五你不来，
猛虎藏身真不该；
融安歌会真热闹，
为何不来考肚才？

答

家庭贫苦路头多，
为钱为米走江河；
融安歌会虽热闹，
哪有心思来唱歌。

四

你聪明，
你今是个大文人；
挥毫好比龙舞剑，
提笔吓死鬼神灵。

难忘的插青生涯

罗昌华

回首三十五年前，正值阳春三月天，
红旗漫卷舞春风，映山花开红艳艳。
满腔热血红卫兵，乘船来到溶江边，
上山下乡干革命，插队落户当社员。

插青生活蛮新鲜，群众迎接喜笑颜，
深夜人静空对壁，只有油灯伴床前。
东方发白好睡眠，队长喊寨梦正甜，
脸不洗来口不漱，赤脚下地抢时间。
肩扛锄头手拿镰，挑担牛粪送下田，

走起路来像跳舞， 横横杠杠难起肩。
扛起犁耙拿牛鞭， 牵头牛牯走进田，
寒冬刺骨身发抖， 酷暑炎热喉冒烟。
背上柴刀拿斧头， 男的上山去找钱，
拉木过厢号子起， 冲浪闯滩放排险。
戴起雨帽背起篓， 扯秧插秧又耘田，
收完谷子剪禾把， 女的也顶半边天。
难得今日当“司令”， 插青走后牛走先，
既得工分又得柴， 树底睡觉赛神仙。
买肥挑货争抢先， 得到公社玩半天，
民办老师工最好， 放下牛鞭拿教鞭。
归能电站避风港， 弃农务工可偷闲，
开山点炮累又险， 好过脱鞋去下田。
言语不通难交谈， 鸡和鸭来难对言，
收工回家天已黑， 三更吃饭五更眠。
早出晚归人已困， 衣服一泡好几天，
思亲念友难相见， 手摇电话两头连。
打罢高露打红岩， 总机接线不得闲，
不是哭来就是笑， 边讲边唱大半天。
面对黄土背朝天， 度日好比如度年，
日晒雨淋拼命干， 一天分值角把钱。
一日三餐少油盐， 腰酸背痛夜难眠，

哪个晓得插青苦，半夜思亲泪涟涟。
“扎根农村”喊口号，真实思想不敢言：
回城哪怕做“马五”，工资再少也不嫌。

悠悠岁月长夜天，春夏秋冬年复年，
懂得油盐柴米贵，饱尝世间苦与甜。
接受教育得锻炼，自食其力文武全，
回首往事勤自勉，催人奋进永向前。

荣应福诗词三首

斗牛场

构建圆圆坐岭巍，斗牛场馆耀金辉。
八蹄对抗南山霸，四角争锋北海威。
似虎横凶天地暗，如狮狂斗壤尘飞。
腹饥日落方知晚，动魄惊心步月归。

县城鼓楼赞

别样风姿六角优，天工巧夺技一流。
气超桂北千亭榭，雄冠湘黔万阁楼。
拔地凌云擎玉宇，横空出世会金钩。
钟灵毓秀芳今古，尽显文思誉九洲。

《三江文史资料》读后感

读后感“文史”鲜，昔年怀远尽狼烟。
几多烽火英雄事，才换三江锦绣天。

廖韦春诗词二首

端午节感怀

龙舟香粽五月风，岁岁年年有异同。
千里汨江吟古韵，犹思志士屈原公。

乡村巨变

春风送暖万花娇，迷彩乡村笑语飘。
未缴“皇粮”还获补，学杂免去午餐包。
下乡家电民得惠，看病何愁不报销。
自古未闻稀罕事，和谐盛世步步高。



文史资料审稿会

杨斌义/摄影



三江风雨桥 石峻松/摄影

封面：侗乡鸟巢 石峻松/摄影
封底：老车吟古韵 朱永辉/摄影
人工天湖大塘坳 梁克川/摄影

